

1907年新加坡的中元節與驅瘟逐疫

蔡志祥

一、1907 年的霍亂與中元祭祀

1907 年 7 月，新加坡爆發霍亂疫症。根據翌年新加坡總督的彙報，在 1907 年全島共有 619,776 人。當年的死亡率為千份之 39.07。因為疫症死亡的共有 201 人，其中包括死於鼠疫的 15 人、天花的 6 人和霍亂的 180 人。¹ 根據新加坡政府的死亡登記，在 1907 年 7 月，新加坡居民身故者有 1,176 人，其中華人佔 923 人。因為霍亂而死的有 15 人，皆由境外進入新加坡的。但是在 8 月 4 日到 10 日的一星期內，新加坡 328 死者中，華人佔 263 人，其中因為霍亂而死的共有 49 人。² 隨後的一個星期的 338 名死者中，因為霍亂而死亡的有 43 人。³ 感染霍亂的「多屬華人，且以車夫為最。」⁴ 政府的防疫政策是一方面把大部份的染疫者送往外島淇漳山（St. John's Island）隔離，另一方面為了防止疾病在社區廣泛傳播，把包括車夫在內的華人苦力聚居的亞拉街（Arab Street 爪哇街，即現在的阿拉伯街）、港仔墘（Rochore Canal Road 即現今梧槽乾拿路）、巴剎巷（Rochore Road 即現今梧槽路）和小坡二馬路（Victoria Street 即現今維多利亞街）劃為疫區。⁵（參閱圖 1-3）有染疫的地方，政府派差「將該屋所有器物悉付一炬……一人染疫，全屋器物皆燒。」⁶ 對於貧苦無依的華人苦力來說，燒毀屋內所有物品，在經濟上是很大的負擔。因此，為了避免讓政府知道有因為疫病而死亡的同屋者，他們把死者屍體丟棄道旁、山林。⁷ 另一方面，對於孤身外地的貧苦苦力來說，他們要面對死亡的恐懼、以及橫死、死無所葬的遊魂可能帶來的災害的不安。新加坡的華人在 19 世紀中葉，已經廣泛的舉辦中元祭祀活動。⁸ 中元節是華人傳統的賑濟幽魂的節日。但是，這一年的中元節，在爆發霍亂的、有很多苦力居住的地

方舉辦的中元節，明顯的與過去的中元祭祀有所不同。本文希望從 1907 年的中、英文報章的報導，討論在疫症流行時，民衆在安撫幽魂之外，如何對應瘟疫和因為瘟疫而死亡的亡魂的恐懼。

二、華文報章關於 1907 年中元節的報導

我們可以參考的華文報紙包括《叻報》和 1907 年 8 月創刊的《中興日報》。1907 年在整個農曆七月中，《叻報》只有在 8 月 23 日（即農曆七月十五），有一段關於中元的評論。這篇由署名「漁」的作者，沒有提及新加坡的中元祭祀，只是指出應把花費在鬼神的款項，用在國家、教育、慈善等人事方面。全文如下：

（1）《叻報》，1907 年 8 月 23 日。

粵謳：佳節又到。佳節又到、慶賀中元、普度幽魂講起就肉酸。人事你都未修點得神鬼顧眷。自古話事人致事鬼總要次第完全，我地故國危得咁交關做乜唔去打算，荷包咁豐阜就要助吓國民捐，抑或湊款去助學堂或者貧弱可轉，栽培後進致可以種族常存。講到各省災情魂又欲斷，凶年多盜不少咁嘅鄉村。就係窮乏嘅親朋都要防佢抱怨。扶危濟急總要事事周旋，況且積少可以成多唔好話力倦。唉須要合算，人事應先盡，切勿等到覆巢方悔一卵難完。 漁

1907 年 8 月發行的《中興日報》有四則關於華人中元節的報導以及一則印度人（吉寧人）在現在的小印度地方進行的送疫儀式。內容如下：

(1) 《中興日報》，8月23日（農曆七月十五星期五）⁹

諧談：做鬼好過做人（伏）

節屆中元，迷信家到處設盂蘭會，賑濟幽鬼。某老儒見而妒曰，一年來天災流行，饑寒交迫，死人若蟻，而滿人日事抽剝，未【？】其賑濟一人，【？】【？】深仁厚澤以待【？】漢人，如此看來，作滿人百姓，真真賤過鬼罷。適某甲在旁，偷聞其言，不禁歎曰，怪不得人人說道，如果不革命，做鬼好過做人了

(2) 《中興日報》8月28日：

（本坡）愚民造謠 本坡往年逢七月中元，迷信家到處設盂蘭會，賑濟幽冥，燒紙物【？】山積，所費不貲，亦甚無謂。近日風氣漸開，作此舉者已寥寥無幾。蓋亦華人進化之明徵也。日作竟有無數愚民言盂蘭會之冷淡，皆因一般有錢商家不肯捐提，故托言無鬼以慳荷包，勢必【？】諸幽鬼，使降之禍等語，又謂某商之妻妾因怕鬼搗【？】，乃避居山園云。

（又按）科學發明【？】，神權旁落。年來已略見效。除【？】【？】【？】普通人民，均【？】然【？】【？】神【？】【？】【？】【？】。不足為【？】【？】內【？】【？】神建醮之事。亦日益【？】【？】【？】初，不【？】減少媚神建醮之地方人民。【？】【？】【？】鬼神一點責罰。而【？】【？】【？】【？】命者。是可知迷信者確無神福【？】【？】。而陰通者必無被神【？】【？】【？】矣。南洋華僑，居外人【？】【？】，習見【？】明【？】【？】長智識【？】【？】。應比內地稍勝一籌。乃何以年來內地迷信神權之惡習，日已減少。而外地人之迷信，曾不【？】少減也。豈不為內地人所竊笑耶。而本埠華僑，多數為食力之輩，每日竭其精力，以博【？】毫。血汗之資，理應愛惜。今竟以頻年積儲之費，擲諸渺茫不可知之地。計一日之事，所費輒百拾金。雖曰眾力易舉，而此百十金之血款，何莫將來作公益之舉也。願迷信者其熟思之。

按：無論是《叻報》或《中興日報》，都有着濃厚的反對在中元節消費巨款來施幽祭鬼的迷信行爲。從資料（1）和（2）的報導中，我們或許可以在中元節的捐款中，意識到 20 世紀初華人的階級差異如何反映在對於迷信的理解和民間宗教的實行中。

(3) 《中興日報》，8月29日：

（本坡）和尚送疫。昨日本坡實龍岡地方，吉寧人巡【？】送疫。其中一吉寧和尚，裝成花面，數人挑之，沿途有舞者，甚是奇【？】。

按：實龍岡是印度人聚居的地方。印度人在 1907 年的農曆七月巡遊逐疫，一方面是因為霍亂在苦力、貧民居住的地方肆虐，印度苦力也不能幸免。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到鄰近的華人力車夫的驅瘟逐疫儀式的影響。（見附錄一和四）

(4) 《中興日報》，9月4日：

(本坡)民智漸啟。是年七月孟蘭，本坡商戶，多是改良，或有廢去者。但小坡新街，桂蘭街，新之街、馬交新街、長太街一帶，仍未改良。上年熱鬧，今春冷淡可見矣。今晚牛車水寨口普度，又未曉得如何光景也。

按：小坡一帶的街道，大概時海峽時報 (Straits Times) 報導的主要是福建和潮州人聚居的地區。(見附錄三) 對照兩項報導，在這一帶的孟蘭祭祀雖然規模較往年小，但是依然進行。在牛車水居住的主要是廣府人。然而，報章並沒有跟進報導牛車水是否有舉行普渡。

(5) 《中興日報》，9月9日 (八月初二星期一)

(本坡)野蠻之尤。蘇林二姓舟人因迷信賑濟幽鬼，於【?】板路頭放船普渡演戲起禍，於去月廿九、三拾兩天，二姓舟人在杉板路頭及勿基海面，互相毆打。昨日福建幫之大船，竟不敢出而裝貨。商場未免大受窒礙云。

按：無論中英文報章，都鮮有關於水上居民的中元祭祀活動的報導。本則提到的，是在新加坡河口、駁船碼頭附近的水上居民因為普渡演戲而鬥毆，從而影響到商業行為的報導。¹⁰

翻查 1907 年的華文報章，主要是關於中元節的迷信性質的評論以及與過去一樣的在中元節普渡，賑濟幽魂的活動。除了印度人的巡遊逐疫外，並沒有關於這一年新加坡華人在中元節如何利用宗教行事，解決因為疫症流行而引起的憂慮和不安。

三、1907 年英文報章關於中元節的報導要旨

1907 年新加坡英文報章有四則關於華人中元節行事的描述，其內容如下。它們分別是：

(1) 「嚇走霍亂惡魔：人力車夫組織巡遊」是 1907 年 8 月 21 日，即農曆七月十三 (星期三) 關於在星期一 (七月十一) 晚上來自福清的人力車夫用了 2,000 元，在他們聚居的甘榜格蘭 (Kampong Glam) 地方舉辦的驅瘟巡遊的報導：車夫戴上面具，敲鑼打鼓，扛抬旗幟、火炬，巡街驅瘟。他們經過的苦力間都燃燒炮仗，趕走霍亂疫鬼。報導指出，因為街上充滿厲疫惡魔，華人都不讓他們的孩子觀看這樣的巡遊。報導也指出在農曆七月十三，車夫

會在後馬車路 (Ophir Road 即現今奧菲亞路) 附近把四、五艘紙紮的船放出海上。這遣船的儀式，是要把瘟疫 (霍亂的惡魔) 從新加坡送到其他地方。報導者聞說這些福清車夫選擇了香港作為遣送疫鬼的目的地。(詳見附錄一)

(2) 「一艘鬼船」是 1907 年 8 月 24 日 (農曆七月十六日) 關於在 23 日早上一艘幽船 (寶船) 漂流擱淺在丹戎禺 (Tanjong Rhoo) 岸邊的報導。這艘被風吹到岸邊的船長約五英尺的船。這大概是在 8 月 21 日 (農曆七月十三) 福清車夫遣送的載走疫鬼的船。(按，即附錄一 8 月 21 日報導的遣送的船) 船頭兩側寫著「仙船」(寶船? S. S. Delwara) 字樣。船有桅有帆。船中有槍炮以及數十具紙紮的人形水手。其中一些還有迷你的望遠鏡套在眼睛上。船上載著給「疫鬼」食用的大米、雞蛋和其他食物。觀看的華人都不敢觸碰這艘小船。但是，儘管華人覺得船會帶來災難，一位洋人視這艘小船為藝術品而把船帶回家中。(詳見附錄二)

(3) 「華人鬼節」是 1907 年 8 月 24 日關於在 23 日，即農曆七月十五晚上在福建和潮州人聚居的駁船碼頭 (Boat Quay)，源順街 (Teluk Ayer street 直落亞逸街) 和中街 (Market Street 即現今馬吉街)

的中元節祭祀活動。這個地區有福建人主要的廟宇天福宮和潮州人的粵海清廟。報導主要描述在街上的祭桌擺滿水果、燒豬、鴨、鵝、蟹等祭品，以及金銀衣紙、旗幟和神袍等。這樣的中元節祭祀的形式，和以往報導的沒有分別。（詳見附錄三）

（4）「一個詭異的儀式：驅趕霍亂疫鬼的華人宗教儀式」是 1907 年 8 月 28 日關於在 27 日（即農曆七月十九）在三馬路（Queen Street 即現今奎因街）對開的後馬車路（Ophir Road 即現今奧菲亞路）的苦力間舉行的驅瘟儀式。這是一個由福州、福清和興化的人力車夫及他們的頭家（towkay）集資 5,000 元舉辦的為期十天的驅除霍亂疫鬼的儀式。8 月 27 日是整個儀式的最後一天。作者觀察當日從下午四時開始，兩個多小時的儀式。儀式包括由數名道士¹¹帶領裝扮成惡魔模樣，手持長矛、尖棒的苦力隊伍，以及三艘用竹子和彩紙紮成的帆船模樣的船的巡遊儀式。主要的道士手舞長劍，向著裝滿紙錢、香燭、餅乾、水果、大米的三艘寶船（幽船？）進行遣船儀式。道士並且戳破雞冠，進行用雞冠血將船上的紙紮人形、物品以及船身各部分塗抹的開光點紅儀式。作者提到新加坡的首席衛生檢查官也在場，並且表示希望可以藉此儀式，掃除霍亂瘟疫。¹²開光、遣船儀式進行到約下午六時。之後，道士手執第四艘的小船進入苦力間，進行收疫鬼的儀式。一名道士手執串上紙錢的棍子，另一名道士手持長劍，戲劇性的在苦力間房內徘徊進退，就如與不願被收服的疫鬼搏鬥的樣子。道士和疫鬼之間推拉爭持了約 20 分鐘。在多次來回逡巡之後，道士才半勸誘半強迫的把載著疫鬼的船帶離苦力間。出了苦力間，小船在苦力間和其他帆船之間來回激走五次，最後在圍觀的數百人的吼叫下，小船領著載了黑、紅、藍、綠和黃色的代表疫鬼紙紮像的其他三艘帆船，以及緊隨其後的遊行隊伍，向港仔墘（Rochore Canal Road 梧槽乾拿路）方向出發。到達梧槽河的一個上岸口時，鞭炮、鑼鼓齊鳴，裝扮成疫鬼的苦力隊伍，隨即脫下衣著、洗去臉上的化妝。主要的道士向河的方向揮動長劍，命令疫鬼離

去。接著，以小船為首，最大的寶船最後，一一把船隊焚化。在最大的一艘船上放著活生生的白色小狗、灰色小貓、公雞、鴨子各一隻，以及兩隻白鴿。作者指出在很仔細的觀察下，並沒有看到這些動物在焚化前被帶出來。然而，苦力頭家則信誓旦旦的保證，在焚化寶船、幽船之前，已經把這些動物帶走。（附錄四）

附錄四的作者描述的巡遊、遣船、收鬼、送瘟的過程，和香港長洲太平清醮的遣船儀式非常相像。這儀式的規模、參與的原鄉族群以及費用都顯然較附錄一在甘榜格蘭舉行的更大、更多。例如：連續三個晚上在染疫的街道巡遊驅瘟。幽船四艘，最大的寬廣各為 20 英尺、兩艘長約 15 英尺。作者沒有描述第四艘小船的尺寸，但是由於是儀式專家進行遣船收瘟時用手拿著，所以不會太大。參與的族群不僅是福清的苦力車夫，還有福州和興化的苦力車夫和他們的頭家。此外，和附錄一不一樣的是這次的送瘟儀式是用火化來送走寶船、幽船，而非隨河流把船送到大海。

除了道士之外，報導者觀察到有一名健壯的苦力，翻上白眼，進入精神恍惚的狀態。他不斷地比劃，為在場的人與他們死去的親友溝通。也就是說，在道士進行驅瘟逐疫的同時，神明附體的乩童進行了陰陽溝通的角色。乩童在其他報導沒有出現。

顯然，基於洋人對華人宗教儀式的好奇心，這一年的英文報導，特別注重和往年不一樣的儀式行爲。也就是說，在祭品、演戲以外，特別注意到和以往的中元節不一樣的因為對付霍亂疫症而執行的巡街、收瘟、逐疫、遣船的儀式。

英文報章從他者的角度，描述和洋人自身生活方式不一樣的節日情景。然而，華文報章在報導以外，強調對國人教化的倫理責任，在精英文化的驅動下，無視洋人唧唧稱奇的華人下層階級的儀式行爲。

四、小結：我們這樣理解 1907 年的報章報導

在過去關於新加坡中元節的報導，都有如附錄三的祭品、祭桌規模以及各樣的演劇、街戲的描述，偶然也有關於儀式專家參與的報導。但是沒有

遊街逐疫的報導，也沒有關於遣船儀式的描述。¹³ 1907年臨近農曆7月在苦力間爆發的霍亂，以及政府的防疫政策，令到貧困的華人在精神上和經濟上很大的憂慮和不安。因此，這一年的農曆七月，華人不僅如往常一樣，舉行安撫和救贖孤魂野鬼的儀式；在霍亂爆發的苦力聚居的地方，進行規模大小不一的驅瘟逐疫的儀式。一方面，從英文的報導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儀式的文化差異。這樣的差異，不但是華人對疫鬼的恐懼和洋人對儀式的好奇和祭祀物品的藝術欣賞的差異；而且，從華文報章完全沒有報導這樣規模盛大的儀式的角度來看，顯示華人精英和苦力民眾之間對驅瘟逐疫儀式的取向的差異。¹⁴ 我們也可以觀察到政府在嚴厲執行醫學的防疫政策的同時，理解到容許群眾通過儀式行為來紓解對死亡和災難的不安的重要性。反之，華人精英在遠離迷信的思潮下，疏離了貧苦民眾的宗教行事。在儀式上的報導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儀式執行人如何利用震撼性的模擬行為，不僅提供圍觀人群的娛樂，更重要的是把抽象的靈異世界呈現在群眾眼前，通過擬真的行動，讓圍觀的苦力車夫看到收疫鬼，遣送瘟疫的過程：把霍亂的惡魔驅離苦力間，用神聖力量潔淨受疫鬼禍害的街區，然後在眾目監察下，用火化或水流把載滿疫鬼的幽船、寶船送離新加坡。此外，我們也可以看到不同的儀式專家，在節日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道士透過正統的宗教權威，執行收鬼逐疫的儀式，乩童通過神明附體的方法，成為陰、陽溝通的媒介。苦力車夫不僅捐款，而且參與籌備工作、組成裝扮的巡遊隊伍。從很片面的報導，我們知道頭家的捐款和政府的認可。盛大的儀式活動，吸引觀看的人群。顯然，在觀賞中有着華洋的差異和階級的差異。

我們不能夠從報章的報導中詳細知道儀式場地的佈置、報導以外的其他祭祀儀式，以及福清、福州、興化系族群之外，其他在新加坡的華人族群，如何通過中元祭祀，解決其對疫病和死亡帶來的不安。我們也不知道除了道士的表演以外，有沒有其他的街戲、傀儡戲等的娛樂人鬼神的活動。

1907年新加坡的華人雖然和往年一樣，舉行安撫、賑濟和救贖孤魂野鬼的中元普渡活動。然

而，這一年因為疫病的關係，社會底層的群眾舉辦驅瘟逐疫的儀式，希望藉此紓解在他們生活範圍的地區發生的災難所帶來的精神上的和經濟上的憂慮和不安。我們不能知道福清、福州和興化以外的方言群、以至人力車夫以外的華人職業團體，在一向的賑濟幽魂以外，有沒有舉辦類似的驅瘟逐疫的儀式。然而，在霍亂肆虐的地區，印度人也進行類似的巡遊逐疫儀式。也許，衛生危機的對應方法，跨越了族群的界限。

最後是在人群的心裏，疫鬼應該放逐到什麼地方？香港究竟是福清、福州、興化人心中的污穢、骯髒、敵對的地方；還是華人資料提供人在面對洋人的詢問而提供的方便的答案？

註釋：

¹ “The Governor’s Address”,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October 3, 1908, p.6.

² 「死冊例登」，《叻報》，1907年8月19日。人口案例皆死於淇漳山 (St. John’s Island) 的檢疫站。

³ 「化鶴何年：本坡國家冊報」，《叻報》，1907年8月26日。

⁴ 「霍亂日記」，《叻報》，1907年8月10日。

⁵ “Cholera Outbreak: Over a Dozen Cases Discovered in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August 2, 1907, p.7.

⁶ 「旅人宜慎」，《叻報》，1907年8月10日。

⁷ 疫症爆發期間，不乏這樣的報導：如「棄屍於道」，《叻報》，1907年8月14日；「途有臥蜉」，《叻報》，1907年8月28日；「林內遺屍」，《叻報》，1907年8月31日。

⁸ 蔡志祥，〈從鬼戲到歌台：中元普度的娛樂、表演與儀式〉，《節日研究》，第14輯，頁3-22。

⁹ 【？】為不能辨析的文字。標點為本文作者所加。

¹⁰ 這大概是與清末的反迷信風潮有關。見蔡志祥，〈從反迷信到萬緣會：廣州到東南亞的城市救贖儀式〉，載於李孝悌、陳學然編，《海客瀛洲：傳統中國沿海城市與近代東亞海上世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 30-43。

¹¹ 雖然文章用僧人 (monk) 來形容做儀式的人，但是，從作者描述的儀式行為來看，很像道士進行的收瘟遣船儀式。

¹² 政府高官出席華人的節日，時有報導。如 1887 年因為刺殺華民政務司的緣故，政府為了找出幕後的主使者，禁止華人在街上進行中元祭祀的活動。禁令引起華人群眾的不滿。為了得到華人精英的支援，這一年新加坡總督出席了在福建人的主廟天福宮舉行的儀式。這顯然是一個政治的決定。然而，衛生官僚因為防疫關係而出席中元節的報導，1907 年大概是第一次。關於 1887 年的報導見蔡志祥，〈葬與祭：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新加坡英國殖民政府對華人節日與墳山的管治〉，「臺北州建州百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臺北大學海山研究中心、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新北市立圖書館，2020 年

10 月 30-31 日。

¹² 參考蔡志祥上引〈葬與祭：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新加坡英國殖民政府對華人節日與墳山的管治〉及〈從鬼戲到歌台：中元普度的娛樂、表演與儀式〉二文。

¹³ 這大概與清末的反迷信思潮有關。參考蔡志祥上引〈從反迷信到萬緣會：廣州到東南亞的城市救贖儀式〉一文。

¹⁴ “The coup de grace to ‘chingays’ and ‘sembayang hantus,’” in Song One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2016 (reprint of 1923 by John Murray, London), pp. 602-3. 該書在 1993 年由葉書德翻譯成中文。見宋旺相著、葉書德譯，《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出版發行，1993），頁 343-4。

附錄：1907 年新加坡的英文報章的報導：【】為本文作者所加的說明

附錄一：

“Frightening the Cholera Devils: Ricksha Coolies Organise a Procession”,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21 August 1907 【農曆七月十三，星期三】，p. 2.

The Hockcha 【福清】 ricksha coolies organised a grand procession on Monday night for the purpose of frightening away the cholera devils.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procession cost \$2,000. There were lanterns, flags and torches and everyone in the procession was garbed like a hantu 【鬼】 and had a fiercely painted face. They paraded the streets occupied by ricksha coolies with much beating of gongs. At each depot they were received with cracker firing. Most of those attacked by the cholera were ricksha coolies, and the members of that community believe that they have now frightened away the cholera demons. The procession attracted a good deal of interest in the Kampong Glam district 【甘榜格南，在新加坡河之北，梧槽 Rochor 地區】. Chinese children were not allowed to view the procession as it was believed that numerous “spooks” were about at the time.

We learn that some time to-day 【農曆七月十三，星期三】，four or five model junks will be launched into the sea by the ricksha coolies from the vicinity of Ophir Road. The idea is to send all the cholera demons away from Singapore by the boats to some other country. It is said that the Chinese have selected Hongkong as the place to send the cholera to!

附錄二：

“A ”Hantu“ Ship”,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24 August 1907 【農曆七月十六，星期六】，p.6.

There was much consternation among the natives at Tanjong Rhoo 【丹戎禺】 yesterday morning, when it was discovered that a “kapal hantu” 【鬼船】 or cholera ship had drifted up to the beach. The natives crowded round, but would not touch the little vessel. It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launched from Beach Road 【美芝路】 on Wednesday night 【即 8 月 21 日，農曆七月十三】 by Chinese ricksha coolies, and it was hoped that the cholera demon had taken its departure by the boat. The little craft is nearly five feet in length, and “s.s.Delwara” is painted on each side of the bows. It is beautifully built and has a mast and sails. It carries a number of small guns and a crew of about a dozen dolls, some of whom have miniature telescopes up to their eyes. It is believed by the natives that owing to a squall the ghost ship was run ashore at Tanjong Rhoo. Rice, eggs and foodstuff are on board for the consumption of the “hantu”. A European resident, one of the gallant S.V.C. towed the little ship to his bungalow and placed it in his room. He is looked upon by the natives as a doomed man? He is, however, very pleased with his curious find.

附錄三：

“Chinese Sembayang Hantu” 【華人鬼節】，*The Straits Times*, 24 August, 1907, page 6

The Chinese Sembayang Hantu was celebrated last night. The finest comestibles Singapore could produce were placed on large tables in Boat Quay 【駁船碼頭】，and in Teluk Ayer 【直落亞逸街】 and Market Streets, as offerings to the spirits. As usual, incense was burned and baskets of gold and silver imitation money surrounded the tables.

Rain interfered seriously with the celebration, and, before the Sembayang ended, the banners and other articles of paper and cloth, which decorated the tables, presented a very bedraggled appearance. The various kinds of fruits, the roast pig, geese, ducks, crabs, and so forth, were not injured by the downpour, however, and will make quite as good food for the spirits as if the rain had not fallen.

附錄四

“A Weird Ceremony: Chinese Joss Pidjin: Frightening away the Cholera Demons”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28 August 1907, p.12. 這篇報導在 1923 年宋旺相編撰的關於新加坡華人的書中，有簡單的摘要。（見附錄五）

A unique and most interesting ceremony took place at the ricksha coolie depots in Ophir Road 【奧菲路】，off Queen Street 【奎因街】，yesterday afternoon. A number of cases of Cholera have occurred in these depots lately, and several cases in the immediate vicinity. The coolies and towkays 【頭家】 organised a grand festival for the purpose of frightening away from Singapore the cholera demons. About \$5000 were collected among the towkays and coolies, and for the past ten days, or so, quaint ceremonies have been carried on. On three nights, processions paraded the various streets. The coolies were busy in the meantime building four model junks to carry away the cholera fiends.

The celebrations were brought to a close yesterday afternoon amidst much excitement, and in view of several hundreds of Chinese. The clans participating in the clearing out of the devils were the Hockchews 【福州】, Hockchas 【福清】 and the Hengwahs 【興化】. The ghost ships were made of bamboo and paper and were really works of art. They were cleverly made of various coloured paper, and in shape were exactly like Chinese junks. Two of the craft were about fifteen feet in length and one, the smartest of the lot, was over twenty feet long and broad in proportion. The final ceremony commenced at four o'clock. The three vessels were drawn into the roadway, the two smaller ones were carried and the large one was drawn on wheels. The sails, made of yellow paper, were then hoisted. The leading vessel had as a figurehead, a dragon with a flaming wide open mouth. On tables placed near the ships were candles, roast ducks, fowls, pigs, goats, fruit and cakes. Numerous sheets of sacrificial paper were burned and hundreds of crackers and bombs were let off. About two score ricksha coolies were dressed as demons with grotesquely painted faces. Some of their faces were red, blue, black, green and yellow, and were streaked with white. They were armed with spears and spiked clubs and many had horns fastened on to their heads. They were a fierce looking lot and formed a bodyguard for the fleet. One gigantic Chinaman carried a huge wooden sword and apparently represented an executioner. Several monks in gay robes were chanting prayers round the "Joss", inside the principal depot,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Chinese music. Every few minutes they uttered long drawn out "oughs" in which they were joined by demoniacal bodyguard, while numerous other Chinese blew bamboo-horns. It was a weird spectacle.

Leaning on one of the "joss" tables in the roadway, was a stalwart coolie who appeared to be in a trance. He was in a frenzy and rolled his eyes till only the white were visible. It was explained that he was possessed of a spirit: a god had entered into him. He gesticulated wildly and was believed to be communing with the spirits of the departed. Any one whose friends or relations had died could converse with them through him. He was certainly not shamming. To the writer he appeared to be mad, but a medical gentleman present said, in his opinion, the man was in a trance. He went on unceasingly and untiringly.

The vessels were loaded up with paper money, candles, crackers, fruit and rice. In the largest junk were placed a white pup, a grey kitten, a cock, a duck and a couple of white pigeons. The monks then assembled in front of the largest ship and chanted prayers, while the bodyguard knelt down in the road. The head monk picked up a sharp steel sword and fought a duel with an unseen spirit. He worked himself into a state of frenzy, and the crowd of onlookers stepped back in awe. The monk then picked up a cock and holding it in his left hand and the sword in his right danced about and gesticulated wildly. After some minutes he put the weapon down and pricked the cock's comb with a finger nail. A drop of blood was taken and was mixed with Chinese red ink. The fowl was then put under a joss table and after more incantations had been droned, the high priest mounted on a stool and dabbed the figure head and other parts of the boat with the mixture. He then returned to the Joss table and exhorted the demons to depart in the vessels. The men demons raised pandemonium with their yells of "ough" bamboo horns and banging of drums and clashing of cymbals. The spectators joined the noise. The Chief Sanitary Inspector was present and seemed to be assisting in the devil hunting. He expressed his desire of helping in anything that would drive away the chole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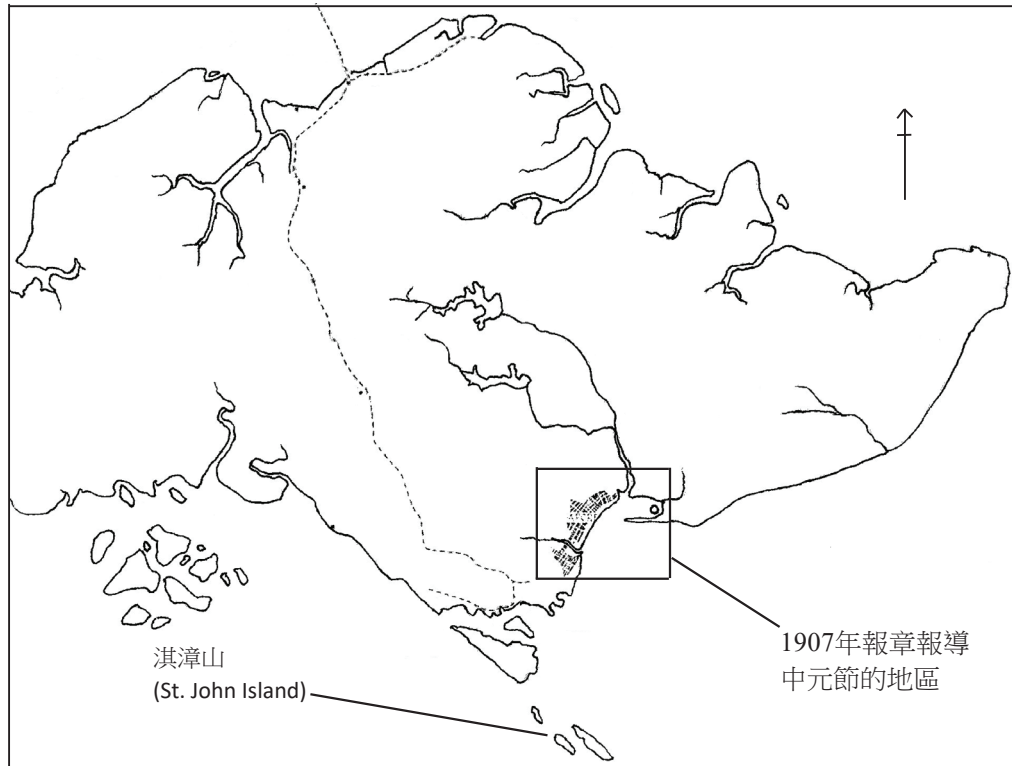
These exhortations continued till six o'clock and a fourth and much smaller vessel then made its appearance. It was apparently a tender to the bigger craft. The chief monk seized the small boat and carried

it into the depot. The idea was to take the devils out to the fleet, but this apparently did not meet with their approval. The little vessel tossed and rocked round the room, but the devils would not come out to the bigger ships. One priest endeavoured to coax the tiny ship out by means of bright papers on the end of a pole, while another priest tried to drive it out with a drawn sword. They sprang back when the boat turned on them. The excitement was great, and the "oughs" were deafening. Several times the boat got as far as the entrance, but returned again and careered wildly round the room. After fully twenty minutes of pitching and tossing, the boat was driven and coaxed out. It careered round the fleet and then dashed back to the depot again. Eventually, the devils were persuaded to leave the depot and the tender made five stormy trips to and from the big junk amidst the wildest excitement. The devils were represented by black, red, blue, green and yellow effigies and they were all put on board at last. The tender then took up a position at the head of the procession and after maneuvering about wildly for some time started off in the direction of Rochore Canal Road. The other vessels and the procession followed it with a rush, and a huge roar went up from the assembled hundreds. After a short mad, yelling rush, a stop was made at a landing stage at the Rochor river 【梧槽河】. Hundreds of bombs and crackers were let off and the gongs and drums were banged madly. The men dressed as demons tore off their devil clothes and washed their faces. The head monk waved his swor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river and exhorted the devils to depart. The fleet were then set on fire one by one. The tender was burned first and the biggest ship last. The flames roared and crackled and burned fiercely and the ceremony was at an end. Our representative, who was watching very carefully, did not see the animals and birds taken out of the big junk before she was set alight and believes that they were burned to death. The towkays, however, assured him that they were removed before fire was put to the vessels. Perhaps, they are afraid of enquiries by the pol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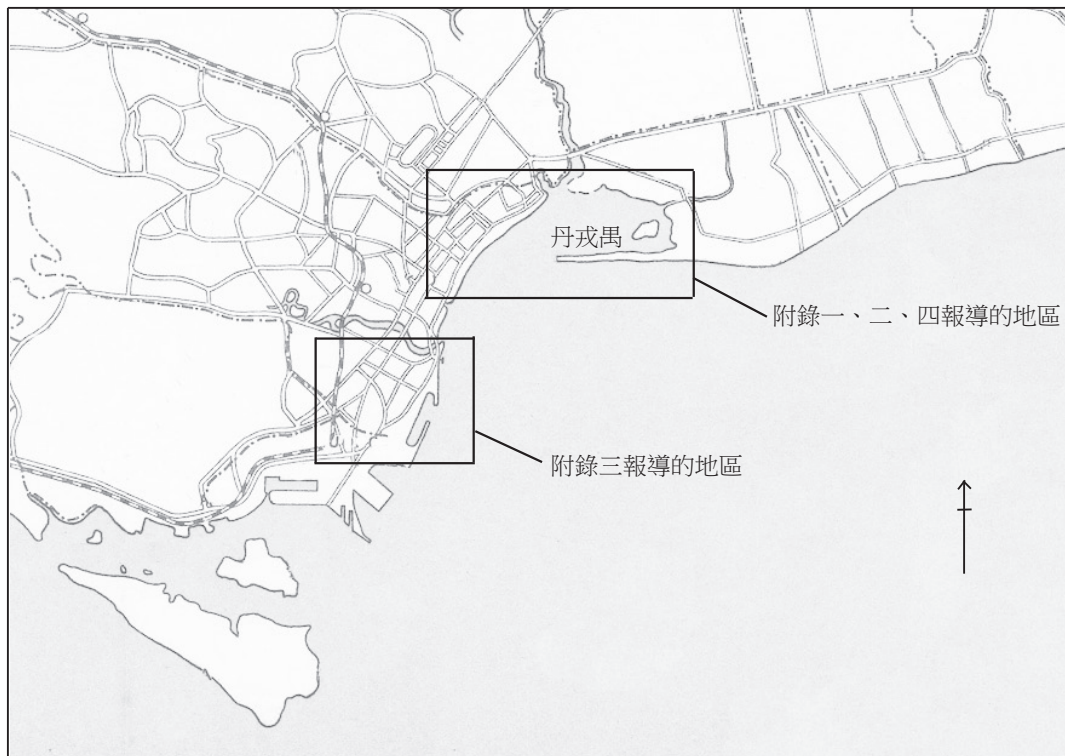
附錄五：（宋旺相著、葉書德譯：343-344）

八月廿七日，在靠近奎因街 Queen Street 的 Ophir Road 人力車苦力間舉行一古怪儀式。在這個苦力間曾經發生了一些霍亂病症，而為著要把霍亂的惡魔嚇走，連續十天沒有間斷地舉行了古怪的儀禮。福州（Hockchew）、福清（Hockchia）和興化（Henghwa）的苦力與他們的頭家（老闆 Towkays）籌集了一筆總數五千元作為肅清惡魔的經費。用竹片和不同顏色的紙張糊制了四隻魔鬼船，船形好像中國的舢板。其長度約十五尺到二十尺之間。在這些紙船中放了些紙錢、稻米、水果和蠟燭；而最大的那只紙船裝有一隻白色小狗、一隻灰色的小貓、一隻公雞、一隻鴨子和一對鴿子。大約有四十個人力車夫穿上像魔鬼的裝束，用油漆塗上奇形怪狀的臉，在他們的頭上縛著角狀的物體，手執長矛和打上長釘的棍棒。這些組成了紙船的護衛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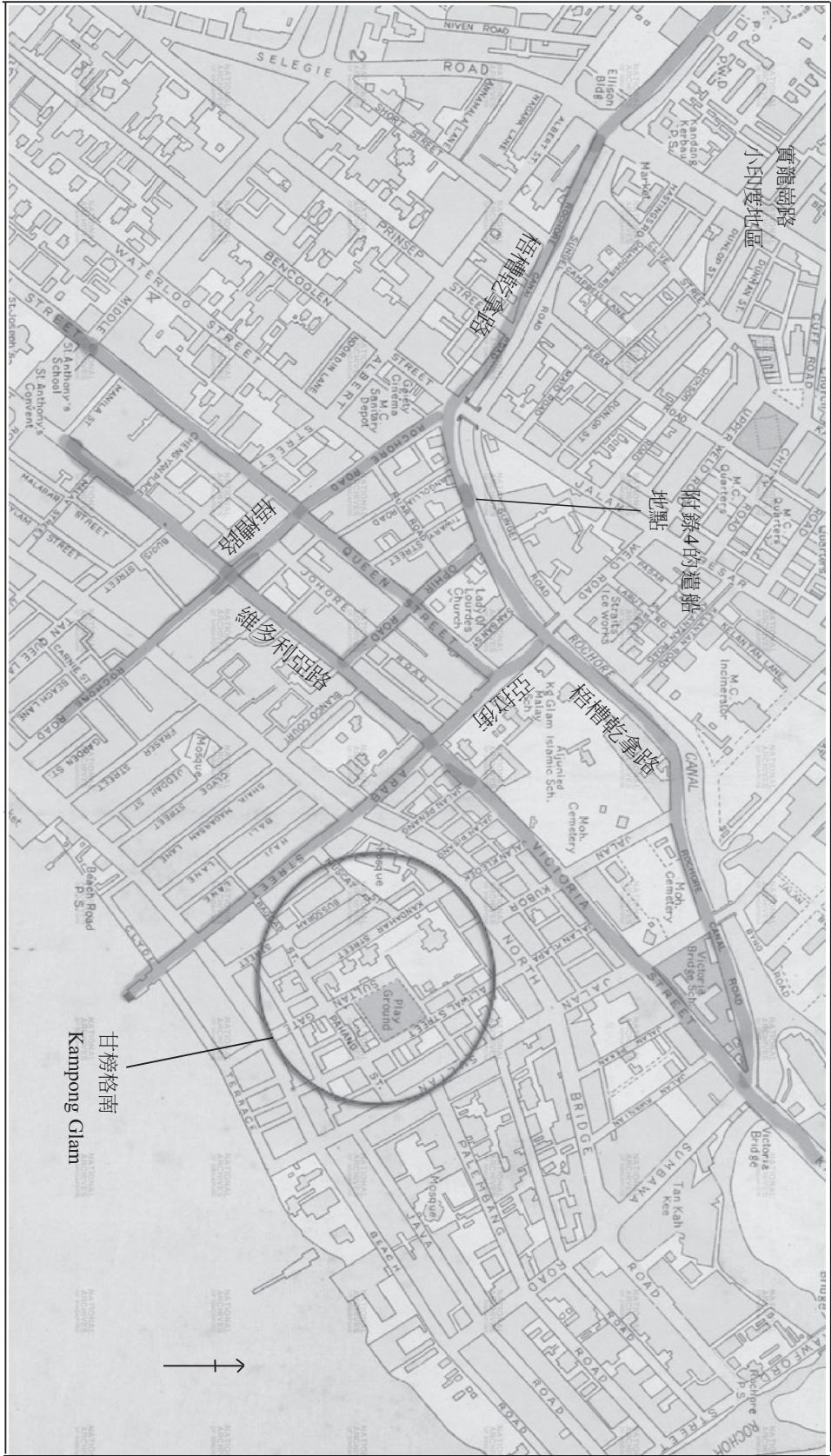
三隻較大的紙船放在路旁，當時幾個和尚開始叨念他們的咒文，被一些扮魔鬼的苦力以跪下的姿態圍繞著。幾小時後，第四只（較小的）船被拿出來。被為首的和尚把它猛撲，並放入苦力間，在這裡面，他們認為霍亂的魔鬼仍在逡巡著。為首的和尚在神壇邊再念了些咒文以後，告誡魔鬼要立即登上船離開這個屋子。當那只小船到了門口，突然再轉回頭，環繞前面的房子猛力沖跑時，引起一陣騷動。這些滑稽戲演了廿分鐘之後，被引到路上，用黑色、紅色、藍色、綠色和黃色等蕭像所代表的魔鬼都被放在那只最大的舢板上。嗣後進行的隊伍猛力而瘋狂地向前猛衝，一路走到梧槽河的上岸處，在那裡鞭炮齊鳴，為首的和尚在河的方向揮舞著他的劍，驅逐魔鬼立即離開，紙船即全被燒掉



圖一、1898 年的新加坡地圖



圖二、1907 年報章報導有中元祭祀的地區



圖三、人力車夫聚居地方以及附錄四報導的儀式範圍。

New Singapore Street Map 1932-1935 https://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maps_building_plans/record-detail/s/f7db6648-115c-11e3-83d5-0050568939ad

香港新界的正一太平清醮：以蓮花地太平清醮為例

趙惠文
香港中文大學

蓮花地位於元朗八鄉南盆地之中，被觀音山、大帽山、大刀叨、雞公嶺及大欖郊野公園等山頭所包圍，被錦上路相隔，是本地人複姓圍村。《嘉慶新安縣志》已有蓮花地名稱，其後才有合山圍這個稱呼。香港政府蓮花地丈量約份第 112 約包括蓮花地、牛徑、水盞田、水流田。水流田和水盞田是後期遷入的客家人村落。

水流田蔡姓與鄧姓是客家人，有指蔡姓來自田夫仔，鄧姓來自橫台山鄧廷桂及荃灣城門鄧國茂後人，可惜暫時缺乏文獻，須要進一步研究才能證實。蓮花地與牛徑關係密切，牛徑村李、鄭及蔡三姓在蓮花地仍有部份土地業權及祖屋。據說因為土地不足，他們祖先遷到現在牛徑開基，牛徑名稱是因為放養牛隻草地經過路徑而得名。過往三姓族人結婚時仍會回來蓮花地神廳祭祀。此外，在二次大戰前，蓮花地、牛徑、水流田與水盞田合辦五年一屆太平清醮，戰後水流田與水盞田才沒有參與，但仍與牛徑合辦「開燈」及太平清醮。原來「開燈」儀式在蓮花地神廳和圍門、水流田廣輝苑天后廟和麻包嶺大王爺廟舉行祭祀，為了方便村民祭祀，年尾酬神時，會請大王爺回神廳供奉，年頭祈福後送回。直至 1997 年蓮花地和牛徑二村仍以合山圍名義合辦太平清醮，但因為牛徑要求擔任建醮委員會主席，蓮花地反對，於是兩村各自用八鄉蓮花地五載耐恩太平清醮及合山圍牛徑村五年一屆太平清醮舉辦，因此，兩村皆是同一年舉辦醮會，同是五年一屆，但牛徑太平清醮儀式較簡化，只有頭尾兩天有儀式。今屆蓮花地聘請陳鈞道館承辦，陳鈞師傅做主科法事儀式。陳權師傅指出，1982 年合山圍太平清醮由陳華師傳承辦。2005 年陳華去世，2007 年合山圍太平清醮由他的徒弟梁承宗（又名梁仲）師傅元朗永安堂承辦，陳鈞師傅做主科。2021

年梁師傅去世後，今屆由陳鈞道館陳鈞師傳承辦及做主科功德法事。但牛徑仍有參與秋分祭祀八鄉古廟祭祀烈士活動，祭祀包括參與與錦田打鬥、抗英及日佔香港時期死亡的八鄉村民。¹

蓮花地建醮委員會會長馮精能指，蓮花地立圍逾 300 年，打醮已逾百年歷史。建村之初有郭、馮、李及鄭姓，其後陸續有謝、鄧、張及陳姓到來。今屆打醮時統計原居民² 共 1,033 人，郭姓有 100 戶佔六成多，馮姓 40 戶佔三成，鄧姓有十戶，謝姓有四戶，張姓兩戶，其餘有李姓和陳姓。³

據《蓮花地郭氏族譜》指，一世祖郭盛生於明永樂十一年（1413），居住在新安縣南頭城內東門。據郭氏福善堂內《八鄉蓮花地村郭氏宗祠巨田祖福善重建碑誌》指，傳至六世祖郭巨田（生於明正德二年，1507 年），到元崗村師塾執教鞭，始遷蓮花地落籍，是該村最早的姓氏，傳至十一世禧隆和旋碧，房分兩祖堂，現時居民年長的已是廿三傳的後人。

馮氏琮友堂後人馮先生指馮氏族譜失傳，據口傳四世祖馮琮友從珠璣巷南遷，輾轉落擔蓮花地，馮琮友被視為蓮花地第一代始祖，至第十世祖馮品立於 1918 年帶同四名兒子於水流田建馮家屋，馮品立在蓮花地後山麻包嶺山腳設窯，燒製磚瓦。⁴

據《新界烏蛟騰李氏族譜》、《李氏族譜》及《烏蛟騰寶安縣烏蛟騰明芳公所傳》指南宋的廣東始祖李敏（字必捷，號達先，法名百八郎）居於長樂縣（今五華縣）玉茶鄉，至第五代李卯龍時移居同縣錫坑「開基」。至十六代李明芳，字克明，號廷勇，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與弟明亮和明和，遷到廣東永安下二約水口村居住。數年後，又遷到歸善龍岡上寮後，三兄弟再分度揚鑿。兄長明芳遷居烏蛟騰；二弟明亮遷居錦田蓮

花地(今八鄉蓮花地)，為今牛徑李氏始祖；三弟明和徙居東莞之客家洞。牛徑明亮公探望烏蛟騰兄長李明芳，但在烏蛟騰過身，當時交通不便，就地安葬在其兄嫂墓地後面。其後人李瓊林於道光年間遷居現今牛徑開基。至李漸鴻曾於宣統二(1910)年考取恩魁後，曾於牛徑翊廷書室、八鄉同益學堂及大埔頭敬羅家塾執教，李漸鴻考獲恩魁牌匾及表揚旗幟仍在蓮花地。⁵

據《鄭榮陽堂八鄉鄭氏家譜》元朗大井鄭氏始祖為鄭賓(字克誠)，他是福建莆田支派第二十傳，宋末授潮陽縣令，陞惠陽郡倅廣州路僉判朝奉，始由福建莆田遷東莞白沙鄉；其間支派繁衍。十世祖鄭繼仁，原居東莞縣白沙鄉坡樂坊，後遷樟村寄居，因官遷新安大井圍安居樂業。後輾轉遷錦田蓮花地定居，及後分支。鄭克誠十四傳汝賢、汝賢、汝昌三兄弟。其中三弟鄭汝昌支派，先居今八鄉蓮花地，大約清嘉慶年間，再遷牛徑開基，是鄭氏達善堂始祖。

蓮花地村民祖先落擔安定後，開始定下舉辦每5年一屆太平清醮。屆期年初建醮委員會便開始籌備工作，完燈後開始筊杯選緣首，今屆因為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將筊杯日期延期至四月廿三日及廿四日在神廳舉行，為了「鼓勵壬寅建醮問卜成功者，一至五名緣首及首名醮首由郭永昌村長獎賞每位利是一封」，只要是蓮花地原居民男丁便合資格參加⁶，首先筊杯獲得最少七勝一寶者便成為頭名緣首。結果頭名緣首由郭森全率先取得八勝一寶，其後緣首順序是郭義華、馮劍成、郭振超、郭錦堂；然後選頭名醮首，由馮國強取得八勝一寶，其餘18名醮首先後被選出。過往由緣首負責整個醮會事宜，但因為近年年輕一輩不懂儀式不願參加，以及1992年有緣首說了不恰當的說話後，改由村長及父老任顧問，協助醮會行政事宜，緣首專心代表村民祭祀儀式。⁷ 緣首及醮首選出後，請風水先生擬定吉課，定於2022年12月23至27日，「三晝連宵」，以酬謝神明庇佑及超幽法事。村民會請假幫忙醮會工作，如果不是疫情影響，移民外國的村民也會回來參與醮會。

這個盛大活動，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因

此建醮委員會根據不同姓氏各有一本丁口簿，分別為郭姓旋碧堂和禧隆堂、馮氏、雜姓及丁口總冊，丁口簿一來是製定蓮花地意文、表文及金榜人名表的依據；二是要據此向村中每一個丁口收取900元丁口錢及每一個門頭收取200元門頭錢。如果祖堂有嘗產，祖堂會代付丁口錢，如郭禧隆堂代付禧隆堂子孫，和郭旋碧堂由應任祖代付這筆醮會丁口錢，而門頭錢則由各門頭自己支付，上一屆因有神功戲演出而要付4,000元。而擲筊杯成為醮首者，要為大會提供一斗米、柴草及一張八仙枱，現今要給大會提供一張枱和100元利是。醮首可以免去醮會工作雜務，醮信則以抽籤安排各人所負責的醮會雜務，而外嫁女及各地鄉村友好可以透過捐助來支持醮會。由於丁口冊可作為原居民身份的證明，曾經有一屆在蓮花地非原居民養鴨養豬戶，想透過捐款參與醮會，因而引起爭議，其後不再接受非原居民捐款參與醮會。根據在辦事處棚張貼的資料，截至12月27日香油錢收入10,3440元，丁口錢戶口錢收入1,134,100元，以支付今屆社區內大型宗教活動費用。

建醮啟壇前，三次發表邀請神明到來醮場參加醮會，以表誠意。五月廿九日上頭表及七月卅一日上二表都在圍門前風水池傍舉行。十二月廿三日上三表則在醮場三清壇內舉行。主科陳鈞師傅向天、地、水和陽三界四府的神明發出三次邀請函儀式。在儀式中，在誦讀村民名字後，陳權師傅用雄雞冠血將寫有村民名字表文潔淨，然後連同功曹馬化去，邀請各界神明蒞臨參加醮會。上三表後，醮會正式開始，供枱換上齋菜，開始守齋。⁸

取水儀式的取水位置在過往水井傍，根據風水師蔡真步堂第四代傳人擇吉位取水。在取水儀式，主科使用《取水科》科儀，具職位錄，並奏請水府各聖降臨、敬茶酒、讀意文、化寶及辭神拜謝。師傅化玉華司符於龍缸內，然後緣首取水倒進龍缸內，稱為「龍水」，由師傅用紅色封條封好，上寫「元始一炁萬神雷司封」。取水儀式完成後，「龍水」被抬回經棚內三清殿前。打醮後，「龍水」成為開投的福品，以前有戶養豬的村民，每屆都會投「龍水」，據郭殷健說「龍

水」會令母豬「好生養」。現在因為養豬戶沒有養豬，今屆「龍水」是由一位名禮叔的村民用1萬元投得。⁹

接著村民在村的不同位置豎立幡竿。村民預先擇吉日在水盞田斬下竹身厚肉的竹子作為幡竿和五枝旗仔(用在行朝時使用的八寶幡)。豎立幡竿是用以召來幽靈至醮場內接受施食超度。由於幽靈眾多，難免秩序混亂，所以有城隍(村民稱玉皇¹⁰)監督，大士王維持秩序。幡竿由幡公的守幡童子守衛，每天由師傅與緣首早、午、晚三次朝拜供飯，直至祭幽化大士止。蓮花地分別豎立三枝幡，第一支幡在東方：守幡童子大天尊；第二支幡在西方：諸天朝會大天尊；第三支幡在北方：迎鑾接駕大天尊。前幾屆豎幡竿位置是在東方、南方及北方，今屆南方幡竿改在蓮花地西方。北方幡竿原在錦上華巒，後因土地發展後改為接近海棠花園對面空地。¹¹

然後，邀請地方主神、神廳諸神及護圍大王爺來到神棚接受供奉，答謝五年來的庇佑。眾緣首及工作人員分別乘坐兩部紅色小巴到八鄉古廟請神，廟祝為鄉民祈求合境平安後，便上香化衣，由緣首等村民奉觀音、天后、華光、侯王及關公等13個神明行身到神棚供奉。蓮花地在2012年之前，有請八鄉古廟內烈士木主回到神棚內供奉。¹²除了八鄉古廟神明外，還有神廳內包括「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等¹³諸神木主神位及麻包嶺大王爺紙神牌到神棚供奉。如果鄉民結婚，除祭祖外，還要到麻包嶺大王爺拜祭稟告結婚事宜。

化文書(啟壇建醮)是宣示醮會正式開始的儀式，科儀是用《發奏科》。禮生陳權(道名：陳安德)師傅手持塵拂，引領高功、眾師傅及緣首醮首順序「肅衣整冠」和「潔淨」。主科陳鈞(道名：陳泓德)為意文開光後，將意文和意亭交予頭名緣首。「意文」是通過緣首和師傅向神明稟告有份請求庇佑的人名。「意亭」內插有一把小銀刀，守衛意文，免受外邪侵襲。銀刀由大會訂造，過往在元朗永隆金鋪訂造，今屆在國內訂造，散齋後贈送給頭名緣首。¹⁴

主科先讀解穢符文「九鳳破奏符」潔淨，主科透過化符、噴灑符水、行罡踏斗淨壇，分配掌

符水、符、法劍、五雷令給不同司職師傅，分別有禮都講事黃振忠(道名：黃玄生)、讀表白事郭心明、讚值壇事郭子奇及吟嘯經事陳進明師傅。有了法力後，在三清殿和神棚前化符及灑符水，用劍和五雷令潔淨。回經壇後，主科在天階功曹馬前請職籙位，再由師傅宣讀表文，當村民聽到自己柱內姓名時，便回應「到」。宣讀意文後，由禮生用雄雞冠血沾酒，為表文潔淨，並為功曹馬打花紅開光及敬酒，將表文捲好放入白色封函，上書「元始一炁萬神雷司 封」連公文發上如「流金火鈴大將軍」等神明。主科令功曹持資牒文、表文到天庭，奏請天地水陽宮各界神明，來醮場參與醮會。

建醮後第一天，「開啟迎真」請道教張天師和三清到臨壇場。鍾卓維師傅與緣首、醮首在神棚前做早課，然後由陳權師傅向三清殿前奉請師公，如祖師玄中教主靜老天尊、祖師三天扶教大法天尊和左衛法主張天師等降臨壇所行道。「開啟迎真」請師是第一天才執行的儀式。

然後，是朝懺，使用《朝科》「三朝三懺」為村民向神祇懺悔過去一周所犯罪孽的儀式。由鍾卓維等五位師傅率同眾緣首、醮首及騎五枝旗仔(八寶幡)工作人員，在早、午、晚三次朝拜醮場內張天師、神明、幡亭、大士王、城隍爺、三清壇外左右龍虎門將，回到三清殿，鍾師傅禮讚神明，發朝表文，至不同宮，如第一天早上朝懺是「昊天金闕宮」；第一天下午「中天星主宮」；第一天早晚上「承天效法宮」等。早懺後，即行午朝，晚朝前行午懺。而第一天建醮晚懺在分燈進燭前，第二天晚懺在小幽前，第三天晚懺在大士出巡時。

建醮後第一晚是「分燈進燭」。對於村民來說，人口興旺及家宅平安是最重要的事。燈與丁同音，分燈就如分丁，正如學者Michael R. Saso的宇宙再生(cosmic renewal)理論，師父鳴鐘擊磬，象徵陰陽和合，召集陰陽神明，「分燈散輝」來象徵宇宙的重新開始，在神明前進燭，就如社區內的人丁，在神明前登記。

「分燈進燭」是使用《分燈科》科儀，三清殿爐前，擺放科儀經書、三個手爐、後排有六對

蠟燭插在蘋果上、紙扇、胭脂、水粉、毛筆及墨汁。

由鍾卓維師傅、都講官黃振忠師傅和值壇官陳進明師傅，鍾師傅噴灑符水潔淨，具籙職位，伏於三清宮前奏請九帝，宿啟瑤壇，迎接真馭。都講官宣讀「雷霆都司擗扉」牒文，恭請把守陰關的「神霄擗扉大將軍」召集陰神，下駐醮壇及將其牒文焚化，振金鐘廿五聲；值壇官宣告「雷霆都司禁玉」牒文，恭請把守陽關的「神霄禁玉大將軍」召集陽神，下駐醮壇及將其牒文焚化，直壇官擊玉磬卅韻，召集真靈。之後，都講官召集陰神及直壇官請陽神到壇兩官「鐘磬交鳴各卅六聲合共七十二聲」、「振金鐘九聲」、「擊玉磬六韻」。重新再具籙職位，主科恭請「虛無自然九天上帝」等諸神，聖駕光臨，三位師傅手持爐分別貼上黃色符，上書「大聖上清真境靈寶天尊」、「大聖玉清聖境元始天尊」和「太清仙境靈寶天尊」，主科奏請「願賜開光，分燈散輝」，師傅再燃點插在蘋果上的蠟燭，分發各眾緣首醮首，將燭放進神棚內神明前，分燈進燭儀式便完結。¹⁵

接著是「禁壇打武」。「禁壇」儀式是透過五方神明結界來保護壇場，使用「禁壇科」科儀。三清殿前，主科噴灑符水潔淨，具職籙位，恭請「虛無自然七寶至尊」等神明「潔淨壇界」，手持五雷令唸咒召請真人護身，行罡踏斗，噴符水潔淨，召南方赤帝赤龍君、五顯靈官馬元帥、「勅斬鬼頭王馬元帥」等聞令速到壇，「潔淨壇界」、「滅妖魔」、「收妖邪」。接著手持法劍和符水，向懸掛大羅天叱雞頒符，以雄雞冠血為大羅天廿八宿符及五個方位打花紅潔淨開光。接著到三清壇前空地，演練「打武」。¹⁶

「打武」是插在「禁壇」中間的儀式，師傅脫去道袍，演練「紅櫻槍」、「火蓆」和「流星」，代表主科招集天兵天將到壇場演練，特別是持「火鉢」的師傅頭繫紅巾及腰繫戰裙服裝，類似閩山派師公。師傅手持「火鉢」分別到神棚、城隍爺棚、大土王棚及龍虎二將門神前，口說收邪破禁，最後回到三清壇前香爐枱下，

將「火鉢」倒蓋在香案下，用「元始一炁萬神雷司」符封好，這儀式是收邪破禁，將醮場內不潔的東西收起來。

「打武」儀式後，主科以法劍穿符紙，一手拿著幡旗，唸「敕符」咒，分別請來「東方青靈始老尊九炁天君」、「南方丹靈真炁三炁天君」、「西方皓靈黃老七炁天君」、「北方五靈玄老五炁天君」、「中央玄靈元老一炁天君」，然後，各綁五炁幡旗，並將五炁幡旗壇內劃行五方結界，再將劍插在中央位置(三清殿下香案)，唸化寶咒。禁壇打武後，三清壇外有龍虎二門神守衛，內有結界及大羅天護罩，妖精邪魔難以入侵。¹⁷

建醮第二天，「啟榜」是有份參加村民人名榜(人緣榜)，透過主科呈上神明，祈求神明保佑。金榜(即人緣榜)可反映社區形態，單姓村是以血緣宗族結盟的社區，複姓社區以地域關係結盟，只要登記在金榜上，即使沒有任何血緣關係，也可以被確認為社區成員。換言之，昔日在農業社會，需要人力資源或受到強鄰威脅時，須要互助而結盟的社區中，週期性打醮是用來確保同盟關係和地域內人力資源的方法。所以，打醮的金榜，也是登記社區內的成員的一種方法。¹⁸對村民來說，他們通過打醮金榜，得以再次確認其在社區內團體的身份。¹⁹

啟榜儀式中，禮生陳權師傅手持塵拂，引領高功、眾師傅及緣首、醮首順序「肅衣整冠」和「潔淨」，主科與各師傅在金榜簽名²⁰；接著頭名緣首在幽榜簽名，代表有份的村民向醮場範圍內的孤魂，分衣施食，祭幽超度的功德。然後，師傅將榜交到眾緣首、醮首手中，請他們貼榜。研究者特別留意這個榜文，因為除了「八鄉蓮花地五載耐恩太平清醮丁口總冊」外，榜文是瞭解蓮花地社會結構的重要材料。村民貼好金榜後。陳權師傅用雄雞冠血沾酒，潔淨表文，由陳進明師傅誦讀時，村民很仔細確認自己及家人姓名有否錯漏，以免錯失祈福。每個家庭成員名單代表組成一個「柱」，不包括外嫁女，「柱」上最年長者的男性為戶主，最多的一「柱」是一個有23人的擴張家庭。

八鄉蓮花地醒獅團醒獅亦到來賀醮，除參拜金榜外，還有向神明、各姓氏祠堂、家祠參拜。除金榜外，還有款榜及幽榜，款榜是羅列由上表開始，建醮期間所進行儀式；幽榜貼在大土王棚，告知「孤魂到壇領衣受食」和「領受及服衣裳，務要形端表正」²¹。

啟榜後，下午是「行鄉」過往其中一個功能能是宣示村落的勢力範圍，現在只是聯誼活動。「行鄉」路線是蓮花地出發，第一站是南慶西路與高上路交界路口的上村石壇；第二站是上村永慶圍(石頭圍)燈棚；第三站是八鄉古廟內神明(觀音、天后、華光、侯王及關帝)及四個社壇；第四站是元崗眾聖廟；第五站是元崗口壇，之後返回蓮花地。因為疫情影響，今屆沒封路措施、龍獅及醒獅團跟隊表演。²² 據郭殷健指前幾屆以步行形式行鄉，參拜廟宇內神明、土地及石壇，加上龍獅表演及休息，大約須五小時才完成行鄉。行鄉隊伍有頭鑼、五枝八寶幡及抬著有香爐的紙紮轎工作人員、眾師傅、緣首、醮首、拜神隊伍、蓮花地金龍醒獅團及八鄉蓮花地醒獅團及村民。2007年有四條金龍及元崗村醒獅一同參與蓮花地行鄉。2012年八鄉中心小學有2隻小醒獅跟隨行鄉，該屆還被元崗新村邀請到該村行鄉。經過上村村公所等友好村落時，龍獅隊會禮拜。在元崗村，當地龍獅會出來迎接。而每到一個大站會有茶點招待，過往是大同老餅家的白餅或芝麻餅。

正醮當日大會邀請官員及友好村落代表來到該村賀醮，而其他友好村落龍獅團也來醮場賀醮。如2017年嘉賓包括新界鄉議局副主席林偉強、中央政府駐港聯絡新界工作部協調處鄧偉勝處長、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元朗民政事務專員袁嘉諾、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鄧瑞民、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梁福元、新田鄉事委員會主席文炳南、錦田鄉事委員會主席鄧賀年、廈村鄉鄉事委員會主席鄧勵東、屏山鄉事委員會主席曾樹和、八鄉分區警官署理指揮官王家強總督察和元朗警民關係處主任李伯豪總督察，在戲棚內致賀辭。²³ 2022年一屆沒有典禮，只宴請八鄉鄉事會、鄉議局、十八鄉、錦田、新田、廈村、屏山、橫洲、牛徑、上村、大埔鄉、元崗、中聯辦及工聯

會等村落友好來賀醮食齋盆。元朗橫洲因為有姓郭居民所以邀請參與賀醮、元崗也有打醮，兩村互有賀醮，四本戲中過往以橫台山關係最友好。²⁴

正醮晚上，「小幽」是使用《幽科》科儀，一般來說，大幽化衣七百廿份，小幽化衣卅六份，在三清壇前空地，擺放祭桌，桌上放置了符及柚葉水、一碗米、經文、笏、香爐及幽包山(上插了一個佛手幽包)，村民在祭桌前面堆起二行沙丘，沙丘前放了判官及賣雜貨兩的紙紮人，村民將香及蠟燭，插在沙丘中間。鍾卓維師傅噴灑符水淨穢，百拜奏請「元始法王無量度人至真天寶」等，以茶酒奉獻。黃師傅宣讀意文。然後，鄉民開始點燃香及蠟燭。鍾師傅念「鄂都山破，地獄門開，面想幽魂」、「召請鄂都城隍司」等「有主無主男女孤魂滯魄鬼神等眾，此夜今時來赴道場，受茲甘露法食」，開始從壇前向沙丘方向擲幽包施食。村民開始化衣，並拿齋菜拋向沙丘向「五音十類男女孤魂等眾」施食，小幽的目的是分衣施食。²⁵

接著是迎聖，使用《請聖科》科儀，發《三天金闕》奏表。道教系統三清、城隍、神廳木主、公曹及公曹馬，由主科師傅和眾緣首、醮首一齊迎接聖駕儀式，來到醮場參與醮會。儀式非常隆重，有六張祭桌迎接神明，祭桌上擺放了一張紮了一把張開了的黑雨傘的摺櫈、祭桌邊被一塊金玉滿堂八仙桌圍圍著、錫製獅子滾球燭臺放了一對雀尾絨球金花，旁有錫製雙耳鼎香爐、香爐插了一對蠟燭、三枝香及胭脂水粉。三清壇天階前擺放一個紙紮天門，上書「恭迎聖駕」，天門前鋪了一塊白色長布，代表法橋。主科陳鈞師傅持笏帶領眾緣首、醮首叩拜後，用符水噴灑淨穢，具職請九帝，誦讀意文。接著由兩名禮生師傅帶領主科逐一向三清及城隍等叩拜、上香說：「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直到九重天。」並三呼萬歲，再辭神叩拜。兩位師傅在天門前，法橋兩旁唱香花請，一邊在法橋散花，再由主科和二位師傅跪在法橋一側迎接三清等神明經過天門到臨醮壇，然後將各神明行身送回壇。

建醮第三天下午走赦書(走文書)，昔日是抽籤選擇村民擔任儀式，被選出者拿著一匹紙

紮功曹馬，背著寫有村民姓名的赦書，繞著蓮花地範圍奔跑，後隨有打鑼者通知所有村民，最後回到醮場將赦書交回師傅，希望透過師傅交到神明，從而得到赦免過去所犯的罪孽。昔日有被抽中是年長者，難以勝任，所以後來改為由自願者出任，大會給予利是。走赦書路線經過牛徑村，過橋橫過錦上路，到水流田屬蓮花地範圍，然後回到醮場。今屆的路線沒有進入牛徑，只在郭旋碧堂經過牛徑邊界橫過錦上路。²⁶ 陳師傅是沙井系，所以儀式有道官與赦官對答：「因為蓮花鄉有表奏上天庭紫微宮、龍顏大喜」，故此命道官帶領赦官頒赦章。主科宣「聖旨到，下跪」，道眾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然後赦官對着村民宣讀赦書，朗讀人名時，鄉民很仔細確認自己及家人姓名有否錯漏，以確保神明赦免其罪孽。讀完赦書後，師傅用雞冠血潔淨，放入黃色封函，上書「三天元皇曲赦道旨頒行」，連同曹馬化去。²⁷

在祭大幽之前，村民將大士王從大士棚抬出巡遊，向社區內大煞氣的地方「照煞」。大會提醒各人在整個巡遊過程中，不可以互相叫喚人名。巡遊主要是環繞錦上路兩旁的鄉村聚落走一個圈，途中在認為是污穢的地點停下「照煞」。村民相信會將製造麻煩的孤魂野鬼「吸走」，令到這地方乾淨。昔日巡遊過程中不會有聲音，除了在污穢地方照煞，工作人員拷銅鑼，引孤魂出來，大士吸走孤魂。²⁸ 巡遊後，村民將大士王抬回醮場內三清壇前空地。

祭幽使用《普施金章科》科儀，道佛結主科坐在「普施」架後，架後祭桌放有五佛冠、法鈴、經書、符水等，架前祭桌有四位陪壇，有六供及香爐。主科先啟師，「甘露門開，孤魂鬼子降來臨」、「此乃超幽度魂之際」、「依科修奉，普施清涼法食一堂」，渡孤魂鬼子盡超昇。主科具職籙位，百拜奏請三界高真同降臨，再獻茶酒，六供供養，宣意文，然後主科戴上五佛冠，主科變身地藏菩薩，搖鈴和做手印，破鄂都，召十方孤魂來到醮場受施衣施食，用符水灑淨去穢，開始從壇前向沙丘方向擲幽包，村民開始化衣，並拿齋菜拋向沙丘向「五音十類男女孤

魂等眾」施食。²⁹

最後，村民抬大士王到另一處化去大士、幽榜及幡竿，村民圍繞大士，化去早上分給村民的碟、衣紙、香燭、幽籙上書「神魂執照」和誠經一齊使用，村民在幽籙及誠經上寫上門頭名及祈禱文；幽籙是用來超幽，是給付幽魂的執照，為幽魂消除孽障，為化幽籙者積功德。而誠敬真經是為化經者解災解難。昔日在錦上華巒的地方化大士，因為土地發展現改為在海棠花園附近空地，大士背向蓮花地焚化。因為拜過神，有些虔誠村民將碟取回家使用。³⁰

祭大幽後翌日早上是散齋，每個門頭領到一份「拜神豬肉」用作酬神，以前是6兩，今屆是8兩，以往因為生活艱難居民會等待收取門頭豬肉才酬神，現在可自行購買，不必等待豬肉來酬神。³¹ 而大會酬神在打醮同月的農曆十二月廿五日舉行，由頭名緣首購買祭品，在神廳和圍門酬神，祭品主要有燒肉、雞及水菓等，這才算是完醮。³²

接新人牌(星晨牌)是村民在桌上將木料或塑膠斗桶排列成兩行，桶內放置油燈(內有燈芯)、兩個銅錢，有取光明、繼後香燈寓意；有芽芋仔2個、有芽慈姑2個，寓意多生男丁；柏葉寓意松柏長青之意；雞公碗碗內紅色和白色米，或者紅色和綠色福祿米，有添福添祿之意；柚葉寓意破邪及驅邪；用紅紙包起2片片糖，意為甜甜蜜蜜；紅紙、薑、桔含意大吉大利；3枝香、利是、星晨牌符，祈求消災解難、延年增壽。由師傅灑符水潔淨後，村民敲打銅鑼，把上述各物品帶回家。村民指在進入家門前斗桶內油燈不可以熄滅，這代表丁火的意思，放在祖先神位前供奉三天，有家祠的村民會將斗桶放在祠堂或家祠供奉三天。

緊接是送聖，主科陳師傅在送聖科時使用《送聖科》科儀，向三清殿前，代表村民感謝神恩，祈求神明繼續庇佑鄉民。然後將門神、金榜焚化，當送走神明及孤魂，代表社區重生了，村民可以食肉。

然後是放生，是使用《放生科》科儀。主科陳鈞師傅發奏表到「水府扶桑宮」，儀式是將兩尾魚和兩隻鳥放生，放生的目的是希望透過行

善積德，祈求神明庇佑。儀式在蓮花苑近牛徑村一條小溪流旁進行，除了魚和鳥外，還有紙紮城隍。主科陳鈞師傅噴符水潔淨，奏職籙，恭請下元水府洞陰大帝等眾聖來臨放生，茶酒斟獻，宣讀意文，誦經，主科誦經說明放生目的是「如今施主買爾回來，你可知恩報德，有義便把義來報，有恩便把恩來酬，開籠放雀歸山去，解網放魚水面遊，放生放在廣種福田」。³³

接著是「行符」儀式，由陳堅及鍾卓維兩位師傅帶領工作人員到有份參與醮會的村民家中逐家逐戶噴灑符水潔淨，以一只紙船收集每戶放在門外代表污穢的物品。戶主將一封利是、米、金銀衣紙和香支交給工作人員。上一屆「行符」時，工作人員攜著一只鴨，寓意用鴨帶走污穢，最後在該村風水池將鴨放生，在醮場外焚化功曹馬及紙船，以示去厄迎祥，社區被潔淨了，而且村民家宅得到天師鎮宅，保福德平安。今屆因為疫情沒有用鴨帶走污穢、只有紙紮功曹馬和船，當師傅噴灑符水後，將巷口符、黃色天師像、斬妖除邪符、紅色的家宅平安符及天師符(右為張道陵天師，左為葛玄天師)交予該戶，由他們貼上。最後，將紙紮功曹馬及船帶回醮場，等待在送神後，才在醮場焚化，上一屆有即時化去功曹馬及紙船。所獲得利是由工作人員分得。

「行符」時大會同時在投福品，大會將醮會內使用過的物品用作福品，讓村民競投，這也是另一個資金來源，應付打醮的開支。晚上大會安排懷舊金曲表演及七十多圍盆菜宴。

清醮完結後，大會安排工作人員乘搭兩部小巴，將神棚內請來的神一一送回神廳和廟宇，大會先送神廳諸神木主和大士爺紙牌神位，再送回八鄉古廟主神。

總之，醮會的目的是酬神及超幽，從儀式來看，醮對社區有潔淨和再生意義，醮會由特定社群、在特定時間舉行的大型社區性宗教活動，社群目的是祈求透過這宗教活動，得到神明庇佑社區內有份參與的人。因此，建醮不但可以強化社區成員聯繫，定義社區界線，過往在行鄉時宣示村落的勢力範圍雖然退減，但紳耆透過籌辦醮會秋祭，成為地區領袖，它亦具有社區性和常規性

的社會宗教活動。

註釋：

- ¹ 2023年2月17日在蓮花地村公所訪問馮精能村長、郭振雄村長及郭殷健。
- ² 據1987年人口統計：雜姓村，分別有姓郭、李、馮、鄭、鄧、謝、陳及張。郭福善堂68戶572人，李慶善堂53戶381人；馮瑯友堂28戶250人；鄭達善堂12戶110人，其他雜姓13戶108人。
- ³ 2023年2月17日在蓮花地村公所訪問馮精能村長、郭振雄村長及郭殷健。
- ⁴ 2023年2月17日在蓮花地村公所訪問馮精能村長、郭振雄村長及郭殷健。
- ⁵ 2023年2月17日在蓮花地村公所訪問馮精能村長、郭振雄村長及郭殷健。
- ⁶ 2022年4月17日通告《八鄉蓮花地壬寅年醮會籌辦》(占卜緣首)貼在舊村公所門外牆壁。
- ⁷ 2023年2月17日在蓮花地村公所訪問馮精能村長、郭振雄村長及郭殷健。
- ⁸ 通告《僑居本村人士注意》貼在蓮花地在該村附近巴士站、牌坊及辦事處棚等地也張貼了通告：在「十二月廿三日至廿六日為本村齋期，一律禁止攜帶肉類進入本村，同守齋戒」。
- ⁹ 蔡志祥、韋錦新及呂永昇編，《儀式與科儀：香港新界的正一清醮》(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11)，頁199-201。
- ¹⁰ 這是村民把皇朝國家祭厲的傳統與道教神祇的系統相混的結果。
- ¹¹ 2023年2月17日在蓮花地村公所訪問馮精能村長、郭振雄村長及郭殷健。
- ¹² 由鄭嘉仕提供資料。
- ¹³ 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加封護國天后聖母、北方鎮武天上玄天上帝、勅封忠義關聖帝君、勅封五顯華光大帝、護圍土地福正神、神農后稷種穀先師、合圍老幼各命元辰、開山立向歷代先人、時進寶利市僊官、年月招財和合童子之神位。
- ¹⁴ 2023年2月17日在蓮花地村公所訪問馮精能村長、郭振雄村長及郭殷健。
- ¹⁵ 蔡志祥、韋錦新及呂永昇編，《儀式與科儀：

- 香港新界的正一清醮》，頁252-260。
- 16 蔡志祥、韋錦新及呂永昇編，《儀式與科儀：香港新界的正一清醮》，頁261-267。
- 17 蔡志祥、韋錦新及呂永昇編，《儀式與科儀：香港新界的正一清醮》，頁261-267。
- 18 田仲一成著、錢杭任余白譯，《中國的宗族與演劇》（香港，香港三聯書店，2019），頁370：「1976年台山圍蓮花地牛徑打醮金榜各姓戶口調查：郭姓：48戶；李姓：46戶；馮姓：22戶；鄭姓：11戶；鄧姓：4戶；謝姓：3戶；陳姓：1戶；曾姓1戶；蔡姓：1戶；王姓1戶；許姓：1戶；龐姓：1戶；龐姓1戶；黃姓：1戶；蕭姓：1戶；其他：3戶；合計147戶，1083人。」
- 19 蔡志祥著，《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香港：香港三聯書店，2000），頁88。
- 20 主科陳泓德、禮都講事黃振忠（道名：黃玄生）、讀表白事郭心明、讚直壇事郭子奇及吟嘜經事陳進明師傅。
- 21 張貼在大士王棚2022年八鄉蓮花地五載醮恩太平清醮的《幽榜青玄上帝》陳鈞道館文書。
- 22 2022年12月17日告示：「因疫情關係，本屆行鄉不設封路措施，大會只安排喃嘸師傅，連同拜神隊伍乘坐巴士前往下面參拜地點。」
- 23 郭殷健提供2017年（丁酉年）八鄉蓮花地五載一屆太平清醮典禮晚會程序和請帖。
- 24 2023年2月17日在蓮花地村公所訪問馮精能村長、郭振雄村長及郭殷健。
- 25 蔡志祥、韋錦新及呂永昇編，《儀式與科儀：香港新界的正一清醮》，頁318-322。
- 26 2023年2月17日在蓮花地村公所訪問馮精能村長、郭振雄村長及郭殷健。
- 27 蔡志祥、韋錦新及呂永昇編，《儀式與科儀：香港新界的正一清醮》，頁341-343。
- 28 2023年2月17日在蓮花地村公所訪問馮精能村長、郭振雄村長及郭殷健。
- 29 蔡志祥、韋錦新及呂永昇編，《儀式與科儀：香港新界的正一清醮》，頁349-389。
- 30 2023年2月17日在蓮花地村公所訪問馮精能村長、郭振雄村長及郭殷健。
- 31 2023年2月17日在蓮花地村公所訪問馮精能村長、郭振雄村長及郭殷健。
- 32 貼在舊村公所公示板2023年1月16日「蓮花地壬寅年太平清醮完月拜神」通告。
- 33 蔡志祥、韋錦新及呂永昇編，《儀式與科儀：香港新界的正一清醮》，頁345-348。

活動紀要：「月港北港與海上絲綢之路」研討會 暨回到歷史現場——廈門大學歷史系 2018 級本科生「文獻與田野」實習彙報會

于沉

廈門大學歷史系 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

2022 年 1 月 10 日由廈門大學歷史系與漳州台商投資區聯合舉辦，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承辦的「月港北港與海上絲綢之路」研討會暨回到歷史現場——廈門大學歷史系 2018 級本科生「文獻與田野」實習彙報會，在漳州角美舉行。漳州台商投資區社會事務綜合服務中心主任李文勇和社管局文旅柯洛敏、以及當地文史工作者列席報告會。來自廈門大學歷史系 2018 級的 28 名本科生、13 名研究生以及鄭振滿、張侃、黃向春、饒偉新、鄭莉五位老師參會。報告會流程為分組報告和老師點評。同學們通過考察村落中的宗族與廟宇儀式，試圖瞭解此地區多元的發展模式以及社區運行機制。

向俊奕的報告〈離而不散：清代以來錦宅村的外遷人口與原鄉祠廟系統〉（撰稿人井浩淼、李佳琰、向俊奕）在考察錦宅村禮儀空間的基礎上，分析從前清到晚清再到當代以來錦宅村的外遷人口，並指出這一群體通過參與祠堂和廟宇的建設，與家鄉保持一種「離而不散」的關係。尤其是在晚清民國大變局的背景下，華僑積極捐資建設家鄉的祠堂和廟宇，使得宗族血脈和民間信仰文化不至中斷，而在上世紀 80 年代，臺胞和華僑積極發起和資助廟宇重修，使得錦宅的信仰系統得以重建。正是外遷人口的這些貢獻，使得錦宅民間的宗族與信仰系統得以保留，本地特色文化得以延續，促進了本地社會文化的傳承。

蘭榕生的報告〈從潘厝到番禺：潘啟官的原鄉社會與行商家族的興起〉（撰稿人蘭榕生、薛龍楷、林涵）指出明清時期潘厝原有的社會文化傳統，使潘啟官家族得以崛起。潘家崛起後對原鄉的宗族組織、信仰體系進行全面的改造，但是到了民國以後，政治動盪等原因使得潘厝與南洋的經濟聯繫中斷，外縣異姓人群進入潘厝，逐漸造成潘姓在

潘厝的衰落。報告呈現在改革開放以後潘氏族人為恢復原鄉傳統、整合信仰體系作出的努力。

遊善偉的報告〈大帝恩蔭：白礁村的神廟和社會空間〉（撰稿人郭旭江、遊善偉、袁妙雨）注重從聚落內部發展脈絡來考察白礁慈濟宮。通過系統梳理白礁王氏家族的發展歷程，來探討保生大帝信仰在王氏家族興起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並進一步指出王氏家族的發展也促進保生大帝信仰中心的形成，保生大帝信仰中心的形成與王氏家族發展的相輔相成。

李沐霖的報告〈「神」「祖」交匯：石厝村的信仰空間與儀式生活〉（撰稿人李沐霖、李雨珊、焦點）根據調查所得的各種資料和訪談資訊，對石厝村的廟宇系統和宗族組織進行詳細闡釋。報告指出，石厝存在保生大帝系統和威惠廟系統兩套信仰體系，保生大帝系統的信仰範圍輻射整個石厝行政村，而威惠廟系統是統合在岱洲慈濟宮的保生大帝信仰之下的，只是石厝村下各個社各取所需選擇陳元光或者其部將奉祀，並不具有規模性、跨越村社的儀式行為。

陳惠霞的報告〈求同存異：金山墩尾村三李二張的歷史記憶與禮儀秩序〉（撰稿人鄭淑文、胡哲源、陳惠霞）主要運用口述材料，輔以碑刻榜文，梳理金山村下廳、墩尾、金山、下店四個社的歷史記憶與人群互動。報告指出，墩尾社雖然是李姓單姓村，但村落的形成實際上反映當地「三李二張」等人群遷移流動的過程，這一歷史過程與當地的人群認同、公共事務的展開和社區秩序的建立息息相關。

張中華的報告〈「葉問」：充龍社的宗族關係與象徵系統〉（撰稿人胡歡歡、陸俊芷、張中華）考察充龍社的宗族組織、複雜多樣的神廟系統與社區的關係，強調人們通過血緣關係與象徵儀式緊密

聯繫在一起。文章著重分析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與多樣的信仰儀式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多樣的信仰儀式貫穿充龍社居民一年的生產週期，也伴隨著他們生命中的每一個重要節點。

盧雨的報告〈記憶與傳承：蔡店村歷史文化考察記〉（撰稿人吳成瑤、盧雨、姜世躍）梳理蔡店村蔡、莊兩姓的宗族源流和蔡店村的儀式活動，並利用在一戶人家收集到的契約講述一個古厝流轉的故事。將村落的「大歷史」與村民的「小故事」結合起來，從整體和局部細節這兩個角度出發，呈現蔡店村的歷史風貌與文化傳統。

郭婧儀的報告〈紐帶：楊厝村的海外華僑與原鄉家族〉（撰稿人郭婧儀、景昆瑜、謝霖）利用在田野過程中收集到的族譜、碑刻、僑批等資料，從白石楊氏宗族與海外楊氏族人兩大視角出發，展現楊厝強有力的宗族聯盟的形成過程，以及華僑與原鄉通過血緣紐帶、社會組織等多元的互動模式來保持密切的聯繫。

禹星海的報告〈祖蔭與神麻：丁厝村的千年變遷史〉（撰稿人禹星海、賴梓賢、辛雪琪、吳家昕）圍繞丁厝村的家廟與神廟兩大公共空間，探究村莊延續千年的原因。報告分析自唐以來丁氏發展的歷程，著重分析清代丁氏復界以後重建家廟的意義。報告指出，家廟的重建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既增強族人的凝聚力，又強調丁氏在此地定居發展的悠久歷史事實，為丁氏族人在此地生存提供合法性、正當性的解釋。同時，福文殿作為丁氏族人重要的信仰空間，使得丁氏族人的凝聚力不斷加強。

歐陽鷺婷的報告〈宗親、紳耆與地主：閩南村社中的林氏義莊與臺灣板橋林家〉（撰稿人張智鈺、袁華高、歐陽鷺婷）從社區出發，討論林氏義莊的建立和發展對周邊村落的影響。報告著重描述林氏義莊的設置和運營機制，以及板橋林氏通過林氏義莊在當地的投資行為和產生的影響，認為這種行為不僅改變原有村落的權力結構，也吸引大批閩南山區的外來移民，對聚落產生深刻的影響。

蕭瑀澤的報告〈在地與他鄉：恒蒼林氏的宗族結構與家庭形態〉（撰稿人黃蕾珏、周翔宇、盧映輝、蕭瑀澤）以田野調查中收集到的訪談和族譜資料為基礎，討論恒蒼的宗族結構與秩序的形成過

程，並透過華僑的個人生命史考察僑鄉的家庭形態，勾勒晚清民國時期華僑的跨國生存圖景，揭示華僑在家鄉公共事務與宗族建設中發揮的積極作用。

陳婧的報告〈捐獻：岑兜村的社會網路與社區秩序〉（撰稿人于沉、陳婧、李超）以岑兜福安宮捐款碑和榜文為切入點，展現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當地族人、出嫁女和華僑參與本村公共事務，繼而維持社區生活運行秩序的不同方式。此外，報告還通過僑批的釋讀，展現當地不同類型華僑參與家庭事務與公共事務的方式，以及華僑間網路關係對原鄉的影響。

在每組報告之後，由指導老師進行點評和指導。老師認為，同學的報告內容非常豐富，信息量很大，且通過對收集到的文獻和口述資料的整理與分析，對各個村莊的宗族和神廟系統進行較為詳細地介紹。更為難得的是有些報告能夠圍繞某個主題進行集中討論，這體現學生們探尋歷史真相、挖掘傳統文化內涵的能力。

但同時報告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報告應該進一步聚焦提煉主題，並且要關注學術史，思考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二是報告的內容邏輯不夠嚴謹，章節之間有時會存在割裂；三是報告內容多是描述性的話語，缺少對家族、神廟、儀式等背後的文化闡釋；最後是報告內容往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沒有把村落放在一個更大的區域裡討論，從而很難發現村落歷史轉變或延續的原因。

漳州台商投資區社會事務綜合服務中心主任李文勇主任和廈門大學歷史系張侃主任，認真聆聽了全場報告後，給予精彩的總結。李文勇認為，此次實習參會集共 46 萬餘字，這對於政府瞭解民生，深入鄉村，關心群眾都很有意義。報告會既嚴肅，又活潑，短短 7 天，同學提供數萬字的報告，令人感動。張侃對漳州台商投資區有關部門和領導表示誠摯的感謝，感謝他們為廈門大學在角美進行田野調查提供的大力支持。他指出，廈門大學歷史系學生在九龍江入海口區域進行多次的社區調查，從 2018 年暑假在海滄進行社區調查，到 2019 年暑假、2020 年寒假和 2021 暑假分別在角美進行社區

調查，幾乎涉足了廈漳交界的所有村社。這樣的校地合作意義重大，一方面能使廈漳的歷史文化資源

得到發掘與保護，另一方面也讓學生能夠更好的「回到歷史現場」。

活動消息



2024年2月24日至27日

蒲苔島太平清醮及導賞活動

導賞(一)：2月24日(六)
14:00至16:00

導賞(二)：2月25日(日)
14:00至16:00

集合地點：蒲苔島碼頭

報名及查詢：2358-8939

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參加者請自行於香港仔乘坐渡輪
前往蒲苔島

主辦：蒲苔島值理會有限公司
協辦：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資助：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政府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unding Scheme
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檔案及整理綜述

段雪玉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21世紀以來，清史學界逐步擴大海外清史文獻的搜集與整理，成果豐碩。¹ 本文梳理20世中葉以來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NA）館藏清代檔案的中英文整理成果，介紹尚待整理的館藏清代檔案資源。

英國國家檔案館是世界最大的國家級檔案館之一。² 英國國家檔案館官方網站提供資料庫檢索、線上展覽和教育專欄等深度服務。³ 即便如此，在數量龐大的檔案中搜集可資利用的資料也非易事，最為便捷可靠的辦法是在館內查閱。⁴ 英國國家檔案館館內設有檢索室（the Search Room），其中公開出版的檔案指南、手冊是最全面、最主要的目錄工具書。20世紀60年代，英國公共檔案館出版三卷本《英國公共檔案館文獻指南》是介紹館藏檔案最早、最全面的目錄工具書。⁵ 該館通過與不同學科領域學者合作編撰的方式陸續出版分類檔案指南、手冊等系列工具書，目前官方網站並不提供已出版目錄檢索工具的線上流覽，讀者需採取線上目錄檢索和紙質目錄工具書查詢相結合的方式才能實現檔案的深度利用。

一、英美漢學界對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檔案的整理

1958年，英國駐北京外交代辦處搬遷時發現一批中文檔案資料，這批資料連同其他英文資料於1959年被送往倫敦外交部，並於1961年移交給英國公共檔案館。1963年，大英博物館的埃里克·格林斯特德（Eric Grinstead）研究員和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歷史系張馨保教授聯合發表初步整理成果，他們稱讚這批檔案足以媲美半個世紀前發現的敦煌藏經洞文獻。檔案分成兩部分：《京報》由外交部移交大英博物館政府檔案室收藏⁶；

其餘由英國公共檔案館收藏，分為英文外交檔案（FO228、FO676、FO230、FO233）、駐華貿易總司檔案（FO677）、中國秘書處（The Chinese Secretary's Office, CSO）檔案（FO682）、駐華領事檔案（FO663）等四大類共七個檔案號。其中最特殊的是檔案號FO682的中國秘書處檔案，時間跨度為1793年至1911年，由於內容豐富，被譽為19世紀亞洲歷史博物館。⁷ 英國公共檔案館與倫敦大學亞非研究院（SOAS）合作，委託遠東歷史研究員龐百騰（David Pong）負責整理檔案號FO682的中文檔案。龐百騰分別在1968和1970年相繼發表階段性整理成果《英國公共檔案館藏廣東省檔案》和《19、20世紀中英關係：英國公共檔案館藏英國駐北京公使館中文檔案》。⁸ 1975年，《清代廣東省檔案指南》正式出版。龐百騰流覽了FO682共77個檔案盒全部檔案，認為約有17,000件檔案已經登記，猜測總數約20,000件。龐百騰整理的指南僅涉及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軍繳獲的兩廣總督衙門檔案，共計1,954件，編以新檔案號FO931（FO931/1-FO931/1954）。⁹

大約同一時期，黃宇和（J. Y. Wong）等學者也參加檔案整理。巴蘇（Dilip K. Basu）注意到FO682、FO233有大量1842年以前的檔案，並為1759年至1809年東印度公司中國商人226件檔案編寫摘要。¹⁰ 1972年，黃宇和開始整理檔案號FO682涉及兩次鴉片戰爭的檔案，1983年出版《1839-1860中英關係：鴉片戰爭時代中英外交檔提要》，涵蓋檔案號FO682/1972至FO682/1993共計22件檔案約有2,000項分檔。¹¹ 郭達士（也譯為郭德思，P. D. Coates）作為同一時期整理這批檔案的第三人，負責1861年至1939年英國使館與中國當局15,000多件公使信函檔案，以及1,100多份中國秘書處雜項檔案的整理，並於1983年向倫敦大

學亞非研究院提交整理成果。¹² 龐百騰、黃宇和、郭達士等學者的編目工作至20世紀80年代基本告一段落。經過整理的中國檔案以中文檔案為主，包括清代廣東省檔案、鴉片戰爭檔案、19世紀英國駐華使、領館等三個主題。

考察英國國家檔案館指南、手冊目錄工具書，仍有相當數量的外交部清代檔案仍未受到關注。1964年，英國公共檔案館出版外交部檔案系列清單，其中系列13第6卷《大使館和領事館檔案清單（1879-1913）》約三分之二篇幅為中國檔案目錄，包括FO228至FO681共29個檔案號，分為中國總類（8個）、廈門、廣州、煙臺、鎮江、福州、漢口、宜昌、牛莊、寧波、北京、上海等領事館以及領事館房產契約、出生、死亡、婚姻登記等21個專題。前述埃里克·格林斯特德和張馨保一文介紹的7個檔案號包括在內。這是首次完整詳列該館館藏中國檔案的目錄工具書。¹³ 經過近40年的積累，英國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增加了不少。2002年，邁克爾·羅珀編寫的《英國外交部檔案指南（1782-1968）》出版，它是英國公共檔案館1969年《英國外交部檔案指南（1782-1939）》修訂增補版。¹⁴ 該指南覆蓋英國外交部成立以來1,100多個檔案系列，是英國國家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最完整、最權威的目錄工具書，附錄部分詳細列出國家、專題系列的檔案號索引，其中有48個檔案號屬於中國檔案。指南綜述早期中國檔案的形成：1816年至1823年英國與中國和印度有關的通信開始納入外交部保存的檔（FO566/109）。1833年外交部再次關注中國事務，1835年設立獨立的處理中國事務部門，自此開始相關檔和信函的日記錄。1841年中國事務部門成為常任副部長日常事務部門之一，至1848年的日記錄裝訂成一卷（FO566/110）。指南表明檔案號為FO682中英文檔案除六千餘件檔案仍使用該檔案號，其餘分成四個獨立的專題：清代廣東省檔案（FO931）；中國秘書處檔案（FO932）；東印度公司檔案（FO1048）；雜項檔案（FO1080）。¹⁵

英國外交部清代檔案雖然數量豐富，但分藏在英國政府各個相關部門機構的檔案也有不少，其中僅次於外交部檔案的是殖民部檔案。¹⁶ 1964

年英國公共檔案館出版《殖民部與自治領部檔案手冊》，詳細列出香港與威海衛檔案目錄。其中香港檔案有七類，檔案號為CO129、CO349、CO489、CO403、CO130、CO131、CO132、CO133，時間為1841至1990年。威海衛檔案有五類，檔案號為CO521、CO770、CO771、CO841、CO774，時間為1898至1933年。（包括1998年修訂版）¹⁷ 1965年英國公共檔案館出版《1916年以前殖民部機密檔案清單》。該書按照英國全球殖民區域板塊分為非洲、北美、澳大利亞、東亞、地中海、西印度群島、自治領以及雜類等八個部分，其中東亞檔案號CO882/1-CO882/9，包括香港、威海衛、毛里求斯、斯里蘭卡、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六個殖民區的機密檔案目錄，可與1964年版手冊互補。¹⁸

目前最重要的英國殖民研究資源工具書是2008年曼迪·班頓（Mandy Banton）的《管理帝國：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殖民部檔案指南》。作為受歡迎的英國殖民研究目錄工具書，該指南2011年出版修訂版，2015年修訂版再版。指南分為12章、9個附錄，其中多章涉及中國檔案。附錄一詳細列出英國殖民地檔案所屬檔案號、檔案主題及時期目錄，包括香港和威海衛。香港檔案除1964年手冊已條列檔案號，增加了1960年以後入藏檔案新編檔案號CO1023、CO1030、CO537、CO1070等。也有早期檔案的整理，如將香港1849年之前的檔案單獨編入檔案號CO326，與CO349覆蓋的1849至1952年檔案相銜接。威海衛檔案增加了涉及英國海軍部、陸軍部的早期檔案ADM1、ADM116、ADM125、WO 32、WO 33及 WO 106等。1930年威海衛歸還中國，1931年至1961年的新增檔案則統一編入CO873中。它也介紹了外交部檔案FO17和FO317與香港、威海衛有關的部分內容。¹⁹

1977年，由倫敦大學亞非研究院三位學者聯合編寫的《不列顛群島遠東文獻指南》出版。²⁰ 該指南是首次全面介紹不列顛群島各機構所藏遠東文獻資源的目錄工具書，屬於英國歷史手稿委員會主持、倫敦大學亞非研究院編寫的亞非文獻資源系列指南叢書第三卷。²¹ 龐百騰認為在此之前

研究者主要關注大英博物館、英國公共檔案館等機構所藏有限資源，該指南全面提供不列顛群島所藏遠東檔案文獻的重要資訊，按照政治地理區域劃分為倫敦、英格蘭其他地區、威爾士、蘇格蘭、北愛爾蘭、愛爾蘭共和國等六大部分，私人收藏文獻部分單列在最後。每個部分按字母順序條列，每個收藏機構給出詳細郵政資訊，介紹收藏內容及特點，附錄大事記與參考目錄為研究提供極大便利，擴大研究者利用文獻資源的範圍。指南共182頁，倫敦和英格蘭其他地區共計138頁，佔全書三分之二篇幅。從內容來看，中國文獻佔有絕對比重，其次是日本、韓國文獻，反映英國在遠東以中國為主的利益和興趣。²²

就指南所列不列顛群島收藏機構而言，英國公共檔案館館藏遠東檔案無疑所佔篇幅最多。編纂者詳細整理英國公共檔案館1972年以前出版的系列指南、手冊以及索引、卡片等檢索工具，列出長達27頁、包括17個政府部門及機構的遠東檔案目錄，堪稱英國公共檔案館藏遠東及中國檔案最詳細最全面的目錄工具書。它包括以下這些部門：1. 國家檔管理署（The State Paper Office）；2. 海軍部（Adm）；3. 海軍高等法院（HCA）；4. 空軍部（AIR）；5. 內閣（Cab）；6. 殖民部（CO）；7. 關稅及國內貨物稅稅務局（Customs）；8. 財政及審計署（AO）；9. 外交部（FO）；10. 內政部（HO）；11. 財政部主計長署（PMG）；12. 樞密院（PC）；13. 貿易局（BT）；14. 交通部（MT）；15. 財政部（T）；16. 陸軍部（WO）；17. 就業部（Works）。涉及中國的主要有海軍部、內閣辦公廳、殖民部、關稅及國內貨物稅稅務局、外交部、財政及審計署、貿易局、交通部、陸軍部等9部門檔案，其中內閣檔案、外交部檔案及殖民部檔案數量最多。從目錄標注時期來看，中國檔案以19世紀清代檔案為主，大約佔三分之二。

很少或未被利用且數量較多的還有英國海軍部、財政及審計署、貿易局、陸軍部等政府部門檔案：海軍部秘書處檔案號Adm125所藏1840年以前中國檔案，包括在中國的東印度公司檔案。財政及審計署檔案號AO2收藏的是1803年至1848年英

國駐華貿易總監賬目共計92卷；AO3藏有1840年至1848年在中國擴張的賬目，包括殖民地、領事、海關430卷；AO20所藏1849至1866年向財政大臣申報的駐華貿易賬目124卷。內政部HO118所藏1854年至1863年對華軍事行動獎勵決定的檔案。貿易局BT1所藏1791年至1863年對華貿易信函、檔，包括的主題有商業、關稅、殖民、航海法令、商船等569卷。交通部MT23所藏1901年從印度派往中國的遠征軍檔案。郵政總局1908年關於運送中國的郵件合同檔案等。陸軍部WO1所藏1841年至1844年由中國香港寄給陸軍部長的信函、檔案；WO107所藏1857年至1864年遠征中國計畫等；WO28所藏1900年義和團運動期間英國特遣隊指揮官加塞利中將（Lieutenant-General Gaselee）與官員之間的通信等346卷；WO106所藏1870年至1929年有關中國檔案，特別是和日俄戰爭有關的檔案65盒；WO147所藏1860年至1873年陸軍元帥沃爾斯利子爵（Field Marshal Viscount Wolseley）私人檔案。就業部Works 56/5-6所藏印度政府支付1876年至1900年英國駐中國使館與領事館租金檔案等等。²³

20世紀中葉以後英國國家檔案館致力於將檔案製作為縮微膠捲，如外交部FO931清代廣東省檔案、外交部FO1048東印度公司檔案等。21世紀以來，縮微膠捲與紙質檔案逐步被轉換成數字檔案產品，以專題資料庫的形式通過官網向公眾開放。不過，比起館藏數量巨大的檔案而言，數字檔案產品目前只佔館藏極小部分。²⁴ 另一方面，英國國家檔案館與世界知名資料庫出版公司合作，推出館藏檔案資料庫供公眾使用。其中主要的數字產品出版公司有英國亞當·馬修數字出版社（Adam Mathew Digital, AMD）²⁵、蓋爾資料庫公司（Gale Company）²⁶、ProQuest數字科技公司²⁷ 以及美國East View資訊服務公司（East View Information Service）²⁸ 等，其官方網站皆有數據庫產品介紹並提供目錄下載。以亞當·馬修數字出版社資料庫為例，官方網站目前更新至93個專題資料庫，通過專題、時代、地域三個板塊檢索並提供試用。其中東亞17個專題裏中國有6個，而利用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檔案製作的專題資料庫有

2個：（1）《區域研究：1743-1999年中國與東南亞》（Area Studies: China and South East Asia, 1743-1999）；（2）《英國外交部：1919-1980年中國檔案》（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19-1980）。這兩個專題系列包括外交部、殖民地、財政部等館藏檔案，其中外交部檔案主要是FO371所藏檔案。限於篇幅，本文不做贅述。

二、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清史學者的英國檔案整理工作

1980年，黃光域在《歷史研究》撰文介紹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英軍所掠廣州各官衙檔案的收藏及整理情況。這是龐百騰編纂《清代廣東省檔案指南》出版五年之後，大陸史學界對英國公共檔案館藏清代檔案整理成果的最早介紹。²⁹ 1981年，徐文的〈英國公共檔案館所藏的中文檔案〉一文介紹了英國外交部FO233、FO682、FO931所藏中國檔案，該文主要依據《英國公共檔案館1979年度工作報告》和龐百騰編《清代廣東省檔案指南》序言等資料翻譯整理而成。³⁰ 隨著中英建交，1988年英國環境事務大臣向中國國家檔案局轉交散失在英國的中國廣東清代檔案縮微複製件25卷（共1,954件），至此這批由龐百騰編目的1,954件清代廣東省檔案以縮微膠捲形式為大陸學者利用，這也是中國第一次收到散失在國外的檔案複製件。³¹ 1994年，陳謙平在〈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民國檔案史料概述〉中介紹館藏首相辦公室檔案（PREM）與外交部（FO）兩類檔案所藏晚清民國檔案史料。文章列舉外交部檔案號FO228、FO230、FO233、FO317、FO405、FO415、FO436、FO483、FO562、FO676、FO682等所藏民國檔案，並重點介紹外交部FO371所藏民國檔案。該文首次提到外交部以外其他類別的檔案所藏豐富的中國檔案，且相當一部分是晚清檔案。³² 1996至1997年，楊國楨相繼發表〈洋商與大班：廣東十三行文書初探〉和〈英國外交部中文檔案與林則徐研究〉，抄錄、評介新發現英國外交部檔案號FO233、FO663、FO931所藏廣東十三行、林則徐檔案，為相關研究提供新史料。³³

2003年，趙雄利用實地考察的便利，全面

介紹英國公共檔案館外交部檔案所藏清代檔案。作者主要利用英國公共檔案館官方網站提供的《1782年以來的外交部檔案——海外檔案資訊介紹14》《使館與領事館檔案——海外檔案資訊介紹17》《條約——海外檔案資訊介紹19》等館藏檔案指南，重點介紹FO682、FO931、FO1048、FO1080、FO233等五個清代檔案系列。文章還列舉英國公共檔案館外交部檔案檢索所需要幾種重要出版指南以及互聯網檢索等工具。³⁴ 2004年，馮爾康在增訂版《清史史料學》中除介紹外交部檔案中的清代檔案，還介紹ADM1、ADM116、WO32、WO106、CO29等海軍部、陸軍部、殖民地等檔案中的清代檔案，並提到1983年黃宇和所編《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鴉片戰爭時期中英外交檔提要》。³⁵ 2013年，中國檔案學界介紹英國外交部秘密檔案館發現上百萬份香港政府檔案，其中部分可上溯至19世紀。³⁶

除撰文介紹英國國家檔案館藏中國檔案，清史學者也重視檔案翻譯、影印工作。1993年，胡濱翻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上下）出版，所有編譯資料來自英國藍皮書與英國國家檔案館藏英國外交部檔案，主要是檔案號FO881所藏鴉片戰爭檔案，這是較早翻譯英國檔案的資料集，擴大了鴉片戰爭研究史料來源，提供了新的檔案史料。³⁷ 2009年華林甫出版《英國國家檔案館藏近代中文與圖》，該書所錄為作者訪英期間獲讀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檔案號FO931與圖，曾由龐百騰初步整理。該書全文移錄原圖文字，並做進一步考述。³⁸ 2012年劉志偉和陳玉環主編《葉名琛檔案——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殘牘》八冊出版，該書影印英國外交部FO931總計1,954件檔案，每件重新編寫中文提要。³⁹ 2020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黃宇和編著《葉名琛與第二次鴉片戰爭》，為1983年黃宇和編寫的《1839-1860中英關係：鴉片戰爭時期中英外交檔提要》中譯修訂本。除翻譯原書編目，中譯本增補了第一章〈關於1839-1860年中英外交檔的說明〉和參考文獻部分1983年後論著目錄，將第二次鴉片戰爭相關問題推到21世紀初的學術前沿。⁴⁰ 至此，度藏英國的清代兩廣總督衙門1,954件殘牘經過近半個世紀多

位學者整理，以「縮微膠捲」、「檔案」影印、「輿圖」影印及編寫提要的形式全部回歸中國，為清史學界提供海外清代檔案深度利用的重要範式。

21世紀以來，清史學界對英國藏清代檔案整理、利用有擴大的趨勢。吳義雄利用英國外交部FO17檔案探討鴉片戰爭前中英關係，⁴¹ 近年集中整理外交部檔案號FO1048所藏東印度公司檔案。⁴² 冷東主持2017年國家社科基金重點專案「廣州十三行與海上絲綢之路發展變化研究」，搜集與整理英國國家檔案館、劍橋大學圖書館等機構藏廣州十三行文獻。⁴³ 鄭彬彬、張志雲利用英國外交部檔案FO17和FO228所藏檔案討論近代海關、英國駐華使館情報工作等問題。⁴⁴ 此外，世界史研究學者對英國史、冷戰史等研究學術資源的搜集和整理也涉及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檔案資源介紹，限於篇幅，本文從略。⁴⁵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大陸學者對海外清代檔案等文獻的關注從撰文介紹到檔案影印、購買資料庫等方式，不斷擴大和加深對海外清史文獻的整理和利用。20世紀最後一二十年海外清史研究發生轉變，不再特定於一尊的範式。⁴⁶ 大陸清史學界與海外清史學界的互動，同樣發生在文獻的整理與範式轉變方面。

註釋：

¹ 2004年後清史纂修工程編譯組委託朱政惠教授等主持國內外收藏與清代有關的西文文獻收集與整理系列專案。《清史研究》開闢「清史研究前沿·海外清史」專欄，譯介部分西歐國家近百年學術理路與成就。參見朱政惠，〈美國清史資料及其研究情況述略〉（上下），《中國史研究動態》，2004年第1期，頁21-27及2004年第2期，頁20-26。徐浩、唐博，〈用世界眼光纂修清史——清史纂修編譯類工作述要〉，《清史研究》，2009年第4期，頁125-131。胡祥雨，〈海外清史研究：歷史、趨勢與問題〉，《清史研究》，2020年第4期，頁137-145。

² 英國國家檔案館官方網站：<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訪問時間：2022年2

月9日。參見Janet Foster and Julia Sheppard eds., *British Archives: A Guide to Archive Resourc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New York: Palgrave, 2002, pp.606-607. 2003年4月1日，英國公共檔案館（The Public Records Office, PRO）和英國歷史手稿委員會（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HMC）正式合併，組成英國國家檔案館。英國歷史手稿委員會官方名稱為：The Royal Commission on Historical Manuscripts，但其更廣為所知的名稱是：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簡稱HMC。參見瞿文，〈英國皇家歷史手稿委員會〉，《檔案與建設》，1987年第5期，頁56。王志譯，〈英國政府宣佈成立新的國家檔案館〉，《蘭臺世界》，2002年第10期，頁34。侯英，〈英國國家檔案館最新線上消息〉，《蘭臺世界》，2011年第17期，頁11。

³ 官網上Discovery 欄目擁有超過 3,200 萬條由國家檔案館和全國2,500多個檔案館保存的檔案記錄，其中超過 900 萬條記錄可供下載：<https://discovery.nationalarchives.gov.uk/>，訪問時間：2022年1月26日。參見蔣冠、李曉，〈美、英、澳三國國家檔案館網站數字檔案資源服務情況調查與分析〉，《檔案學研究》，2013年第5期，頁82-90。

⁴ 筆者在赴英國學術訪問期間於2022年1月3日通過官網申請查閱一份檔案，1月31日收到回復，由於該件檔案沒有電子版，只提供複製件，筆者再次提交複製申請，於2月16日收到複製件，耗時較長，效率不高。

⁵ 參見 Public Record Office, *Guide to the Contents of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3 vols., H.M. Stationery Office. 1963-68.

⁶ 參見Eric D Grinstead, "Gordon's Chinese Papers,"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1964, vol.28(3/4), p.83-85. Jonathan Ocko, "The British Museum's Peking Gazette," *Ch'ing-shih wen-t'i*, Volume 2, No.9, 1973, pp.35-49.

⁷ 參見Eric Grinstead, "Hsin-pao Chang, Chinese Documents of the British Embassy in Peking, 1793-

- 1911,”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May, 1963, Vol. 22, No. 3, pp. 354-372. 參見英國國家檔案館官方網站「中國秘書處檔案綜述」：<https://discovery.nationalarchives.gov.uk/details/r/C649>，訪問時間：2022年1月28日。參見張馨保著，徐梅芬譯，《林欽差與鴉片戰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 ⁸ 1966年英國漢學家杜希德撰文介紹龐百騰對這批檔案的整理工作情況。參見D.C. Twitchett, “About David Pong’s work at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in London,” *Ching-shih wen-ti*, Volume 1, No.4, 1966, p. 6. David Pong, “The Kwnagtung Provincial Archives at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of London: A Progress Repor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8; vol. 28 (1), p.139-143. David Pong,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the Chinese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Chinese Language Manuscripts from the British Legation at Peking Deposit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Ch’ing-shih wen-t’i*, Volume 2, No. 4, 1970, pp.40-63. 對杜希德及英國清史研究的最新評介，參見何娜著，胡祥雨譯，〈清史研究在英國〉，《清史研究》，2019年第2期，頁1-10。
- ⁹ David Pong, *A Critical Guide to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Archives Deposited at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 ¹⁰ Dilip K. Basu, “Ch’ing Documents Abroad: From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in London,” *Ch’ing-shih wen-t’i*, Vol. 2, No. 8, 1972, pp. 3-30.
- ¹¹ J. Y. Wong,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839-1860, A Calendar of Chinese Documents in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 Oxford: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參見中譯修訂本：黃宇和，《葉名琛與第二次鴉片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頁25。
- ¹² 郭達士並未將整理結果公開出版，他在1983年發表文章介紹整理經過。參見P. D. Coates, “Documents in Chinese From the Chinese Secretary’s Offic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1861-1939,” *Modern Asian Studies*, 1983, Vol. 17, No. 2. pp.239-255. 另見P. D. Coates,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 1843-1943*,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英國國家檔案館官站檔案號FO682網頁簡略介紹兩位學者的整理工作。參見英國國家檔案館官方網站網頁：<https://discovery.nationalarchives.gov.uk/details/r/C7983>，訪問時間：2022年2月1日。關於郭達士生平及駐華領事檔案整理工作介紹，參見英國聯合檔案線上：<https://archiveshub.jisc.ac.uk/search/archives/b9aeaf15-8e91-3939-a481-fac9239bff81>，訪問時間：2022年2月10日。
- ¹³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List of Foreign Office Records, Vol. 6, Embassy and Consular Archives 1879-1913, Abyssinia-China*, New York: Kraus Reprint Corporation, 1965, pp.139-441.
- ¹⁴ Michael Roper, *The Records of the Foreign Office 1782-1968*, (Public Record Office Handbook No. 33) by Public Record Office Publications, Second edition 2002. First published in 1969 as *The Records of the Foreign Office 1782-1939* (Public Record Office Handbook No. 13) by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94年路易斯·阿瑟頓（Louise Atherton）編撰的《從不抱怨，從不解釋：英國外交部和國家檔案室檔案指南（1500-1960）》出版，是英國公共檔案館讀者指南系列出版物之一。該指南過於簡略，基本不涉及中國檔案，本文從略。參見Louise Atherton, *Never Complain Never Explain: Records of the Foreign Office and State Paper Office 1500-c.1960*, PRO Publications, 1994.
- ¹⁵ Michael Roper, *The Records of the Foreign Office 1782-1968*, pp. 31, 159, 289-314.
- ¹⁶ 張順洪，《英國殖民地公職機構簡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頁29-31。參見Sir Charles Joseph Jeffries, *The Colonial Office, Etc*,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24-25.
- ¹⁷ R.B.Pugh, *The Records of the Colonial and*

- Dominions Offices*,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64, PP. 82-83, 117-118. Anne Thurston於1998年出版該手冊的修訂版《英國公共檔案館的殖民地研究資源》，以第一次世界大戰至20世紀中葉檔案為主。參見Anne Thurston, *Records of the Cabinet, Foreign Office, Treasury and Other Records, Sources For Colonial Studies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Vol.2 No.3, *A Revised and Expanded Version of Public Record Office Handbook, Records of the Colonial and Dominions Offices* by R B Pugh, London: The Station Office, 1998.
- ¹⁸ *Public Record Office Handbooks* No.8, List of Colonial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to 1916,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65, Pp. 124-134.
- ¹⁹ Mandy Banton, *Administering the Empire, 1801-1968: A Guide to the Records of the Colonial Office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2015. pp. 228-229, 302.
- ²⁰ Noel Matthews, M. Doreen Wainwright and J. D. Pearson, *A Guide to Manuscripts and Documents in the British Isles relating to the Far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該指南迄今未見國內評介，本文重點介紹其中有關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檔案部分。
- ²¹ 南亞和東南亞卷、非洲卷分別於1965年、1971年出版。參見Frank Rodgers, "Review," *The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Vol. 13, No. 1 (1978), pp. 110-112.
- ²² David Pong, "Review,"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01, No. 4, 1981, pp. 433-434.
- ²³ Noel Matthews, M. Doreen Wainwright and J. D. Pearson, *A Guide to Manuscripts and Documents in the British Isles relating to the Far East*, pp. 57-74.
- ²⁴ 英國國家檔案館線上免費電子檔案網址：<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help-with-your-research/research-guides/free-online-records-digital-microfilm/>，2022年2月9日訪問。免費電子檔案目錄表明目前館藏免費電子檔案主要是20世紀現代檔案，且以英國本土與歐美國際關係檔案為主，較少涉及遠東及中國檔案。另參見英國檔案聯合線上服務官網：<https://archiveshub.jisc.ac.uk/>，訪問時間：2022年2月10日。
- ²⁵ <https://www.amdigital.co.uk/products>，訪問時間：2022年2月9日。
- ²⁶ <https://www.gale.com/intl/primary-sources>，訪問時間：2022年2月9日。
- ²⁷ <https://about.proquest.com/en/>，訪問時間：2022年2月9日。
- ²⁸ <https://www.eastview.com/>，訪問時間：2022年2月9日。參見姚百慧主編，《世界史研究外文資料庫指南》（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
- ²⁹ 黃光域，〈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軍所掠廣州各官衙檔案的下落〉，《歷史研究》1980年第3期，頁191-192。
- ³⁰ 徐文，〈英國公共檔案館所藏的中文檔案〉，《歷史檔案》，1981年第2期，頁129-130。參見倪道善編著，《明清檔案概論》，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84-87。
- ³¹ 〈我國收回散失在英國的部分檔案複製件〉，《檔案工作》，1989年第1期，頁14。
- ³² 陳謙平，〈倫敦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民國檔案史料概述〉，《民國檔案》，1993年第1期，頁58-65。
- ³³ 楊國楨，〈洋商與大班：廣東十三行文書初探〉，《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頁1-24。楊國楨，〈英國外交部中文檔案與林則徐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頁160-173。
- ³⁴ 趙雄，〈英國外交部檔案及其與清代中國有關檔案概述〉，《歷史檔案》，2003年第4期，頁109-116。參見英國國家檔案館網站：<https://discovery.nationalarchives.gov.uk/details/r/C130>，訪問時間：2022年2月7日。

- ³⁵ 馮爾康，《清史史料學》（瀋陽：瀋陽出版社，2004），頁427-428。
- ³⁶ 參見苟俊傑編譯，〈英國：外交部秘密檔案館發現上百萬份香港政府檔案〉，《中國檔案》，2013年第12期，頁12。還有一些學者專題介紹英國外交部檔案，限於篇幅，本文從略。參見王遠大，〈英國外交部有關中國西藏檔案FO535（1903-1908）〉，《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頁55-63。
- ³⁷ 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上下）（北京：中華書局，1993）。
- ³⁸ 華林甫，〈英藏清軍鎮壓早期太平天國地圖考釋〉，《歷史研究》，2003年第2期，頁66-77。華林甫，《英國國家檔案館皮藏近代中文與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參見韓昭慶，〈中國近代軍事地圖的若干特點——兼評《英國國家檔案館皮藏近代中文與圖》〉，《歷史地理》，第26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457-462。
- ³⁹ 劉志偉、陳玉環主編，《葉名琛檔案——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殘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參見張賢明、柏峰，〈十年磨一劍：《葉名琛檔案——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殘牘》出版紀實〉，《全國新書目》，2013年第6期，頁10-11。
- ⁴⁰ 黃宇和，《葉名琛與第二次鴉片戰爭》。
- ⁴¹ 參見吳義雄，〈權力與體制：義律與1834-1839年的中英關係〉，《歷史研究》，2007年第1期，頁63-87。吳義雄，〈商人集團與中西關係建構——鴉片戰爭前中西關係體制的再認識〉，《史學月刊》，2012年第3期，頁66-76。
- ⁴² 吳義雄主持2014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招標專案「清代廣州口岸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專案號14ZDB043）。參見吳義雄，〈海外文獻與清代中葉的中西關係史研究——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中文檔案之價值〉，《廣東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頁112-124。
- ⁴³ 專案號：17AZS010。參見冷東、羅章鑫，〈「外洋會館圖記」之發現暨「十三行」正名考〉，《古代文明》，2018年第3期，頁115-124。邢思琳，〈英國新發現粵海關中英文船鈔執照〉，《國家航海》第2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頁123-133。冷東、潘劍芬，〈廣州十三行天寶行印章的發現及其意義〉，《廣州文博》第13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頁219-326。邢思琳、冷東，〈英國發現清代嘉慶朝南海縣衙告示考釋〉，《廣州文博》第14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頁132-145。
- ⁴⁴ 鄭郴郴、張志雲，〈江漢關開埠與漢口國際貿易（1858-1869）〉，《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頁100-116。鄭郴郴、張志雲，〈英國駐華使領館的情報工作與修約決策（1843-1869）〉，《歷史研究》，2021年第2期，頁133-156。
- ⁴⁵ 參見李繼高，〈冷戰史研究之英國檔案資源介紹〉，《冷戰國際史研究》，2016年第2期，頁293-315。杜萱瑩，〈走入公眾——近現代英國國家檔案的管理沿革〉，《檔案學通訊》，2019年第3期，頁61-69。姚百慧主編，《冷戰史研究檔案資源導論》，世界知識出版社，2015年。姚百慧主編，《世界史研究外文資料庫指南》（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張乃和主編，《英國經濟社會史文獻學著作指南》（上海：東方出版社，2020）。
- ⁴⁶ 胡祥雨，〈海外清史研究：歷史、趨勢與問題〉，《清史研究》，2020年第4期，頁137-145。參見胡祥雨主編，《百年清史學術史·海外研究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頁10-12。